

# 古典詩詞選評與典律化<sup>1</sup>

王萬象\*

## 摘要

古典詩詞選集的功能是網羅眾作薈萃菁華，在編纂的過程中選家藉以判定優劣，因此具有文學批評的價值。選家如欲求「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當然得博觀典籍英華，超越個人的愛憎輕重，在編選的過程當中，以個人宏觀的眼力、理論的素養和史家的氣魄，來綜輯詞藻。當然，在選本中讀者可見選家的美學主張，而選本的存在價值、作者在選本中的地位和讀者所受選本之影響，也往往繫於選家之手。選家操選政不易，他們為何而選、又選些什麼，與如何來選就成為關鍵所在。選家之文學圖繪容或各有所偏，但畢竟也曾為其時代造像，直接參與文學典律的對話，而難以數計的各種文學選集，其實也就是這種典律化過程中的主要媒介和表達方式。

余寶琳認為中國文學選集有助於經典之形成，尤其是詩歌選評與典律化的密切關係，她注意到選評者如何為詩歌定位，亦指出其歷史現象與問題癥結。余氏的幾篇英文論文深入分析此一議題，特別是古代文士怎樣編選詩歌要籍，除了分析古典詩詞的品第和編集，她還曾經過研究詩歌如何典律化，例如文學選評與經典觀，和毛詩注之寓意探討等相關問題。此外，余氏亦撰寫專文探討歷來詞集綜輯編選的諸多問題，特別強調在詞之典律化的過程中，除了注意詞評、詞籍保存與詞作的接受，我們也應當注意詞人怎樣填詞，以及不同的讀者如何讀解詞作。綜上所述，本文旨在探討中國選本批評原理、古典詩詞的選評、中國詩詞「典律化」與讀者反應，以及余寶琳對中國詩詞典律化的相關研究。

**關鍵詞：**選本批評、典律化、讀者反應、唐人選唐詩、唐宋词選評

<sup>1</sup> 本文作者非常感謝《中興大學中文學報》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的寶貴意見，對改進本論文之缺失助益極大。

\* 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 The Anthologizing and Criticizing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and It's Canon Formation

Wang Wan-Hsiang\*

## Abstract

The function of many anthologies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is to collect numerous works and gather together essentials. In the process of compilation, anthologists can evaluate poetic texts and thus proclaim their aesthetic standards. To judge impartially, anthologists must have broad experience and learning, and be free from individual preconceived evaluations and prejudices. Certainly, readers may understand each anthologist's aesthetic assertions, the position of poet in the anthology, the influences of anthology on readers, and the reason why particular anthology can last forever. It is difficult to anthologize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especially concerning the issues such as why these anthologists collect poetic works, what they usually pick up for their blooms, and how they gather together different texts. Therefore, many anthologists had already dialogued with each other about tremendous poetic *oeuvre* through varied times. In fact, uncountable poetic anthologies in pre-modern China had shown the canon formation and recapitulate the literary value of different milieu.

Pauline Yu, a leading scholar in North-American Sinological circle, believes that Chinese literary anthologies may help canon formation, particularly the collection and criticism of poetry relates to its canonization. She has written several articles about the problems of anthologizing and evaluating Chinese poetic works, and also presents to us a balanced and mature idea of poetic canon. In this paper, I will discuss the following issues: (1) the principle of Chinese compiler's anthologizing as critique; (2) the anthologizing and criticism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3) canon form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reader's response; (4) Pauline Yu's study of collections and canon in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Key words:**The Anthologist as Critic, Canonization, Reader's Response, The Anthologies of T'ang Poetry by the T'ang People, The Anthologizing and Criticism of T'ang and Sung Lyrics

---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 古典詩詞選評與典律化

王萬象

## 壹、前言

古典詩詞選集的功能是網羅眾作薈萃菁華，在編纂的過程中選家藉以判定優劣，因此具有文學批評的價值。選家如欲求「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當然得博觀典籍英華，超越個人的愛憎輕重，在編選的過程當中，以個人宏觀的眼力、理論的素養和史家的氣魄，來綜輯詞藻。當然，在選本中讀者可見選家的美學主張，而選本的存在價值、作者在選本中的地位和讀者所受選本之影響，也往往繫於選家之手。選家操選政不易，他們為何而選、又選些什麼，與如何來選就成為關鍵所在。選家之文學圖繪容或各有所偏，但畢竟也曾為其時代造像，直接參與文學典律的對話，而難以數計的各種文學選集，其實也就是這種典律化過程中的主要媒介和表達方式。中國傳統詩詞之典律化有許多推波助瀾的因素，諸如時代風氣、文體變革、政治思想、文化發展以及出版收藏等，在不同的歷史社會環境裏，或多或少都會影響特定選本的周行流布。然而，古典詩詞的創作與讀解畢竟是少數文士之事，詩詞典律的生成似乎取決於當時的社會菁英，各式各樣的詩詞選本也只有文人雅士方能傳釋，從古代為數甚多的詩話詞話或筆記序跋中，我們不難發現此一狹小之「詮釋社群」(interpretative community)，對詩詞文本所運用的闡發詮解策略。古往今來多少詩詞的典籍英華，姑不論其編輯體例為何，也不管讀者的接受反應是怎樣，實際上它就是文士們的詩學論述場域，而選編者在學術、政治和社會的地位，無疑地又左右詩詞經典的形成。中國古典詩歌要籍保存了韻文菁華，編者蒐羅並篩選文學作品，往往會以文體、時代或編輯宗旨來「刪汰繁蕪，存其清英」，可展示選集編纂的豐富義蘊。一方面，這些選集的編排方式和讀者對它們的接受反應，都將參與文學典律的歷史對話，而另一方面，操選政者藉權力機制循政教途徑傳播，以及讀者對選集權威性的挑戰，凡此種種，皆與西方近世以來的正典論爭，頗有相似之處，值得吾人參照而觀。

文學典律的生成有其曲折複雜的過程，經典的準則並非全繫於一人一家之手，正典的版圖是由無數的作者、編者與讀者所共同形塑打造而成的，這種情形可由林林總總的總集或選集看出端倪。千百年來，唐宋詩詞得以周行流傳，端賴各式各樣的選本，這些選本對於入選之作具有推薦和傳播的功用，有些詩篇因選本之搜集編纂，才得以保存留傳後世。歷代唐宋詩詞選集的編定往往有其明確的宗旨，對於作品取捨的標準相是相當

嚴格的，而選家操選政時也就得慧眼獨具，方可達到去蕪存菁、汰劣換優的效果。唐以後的唐宋詩詞選本無慮數百家，雖然各有去取標準，大抵上都能反映選家的審美旨趣和詩學修養。宋元以來，唐宋詩選詞本最多，然各皆有其特點，亦能從不同的角度來展現唐宋詩詞流變的情形，尤其是專體詩詞選具有詩學典範的意義。降及明清，唐宋詩詞選本的美學旨趣、形式體制、題材內容和分門別類，愈來愈加多采多姿，呈現出繁花盛景的現象。唐宋詩詞選具有很大的詩學史料價值，因為從這些選集中我們可以窺見唐宋詞發展的過程，以及不同流派的風格特色所在，我們如能就這些重要的選本加以觀察其間的異同，或許可以讓我們重新了解某些詞人及其作品的真正價值。這些詩詞選集的產生是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的重要現象，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選家的審美旨趣和去取標準，同時也能夠窺見編者置身其中的時代風尚，它們既能供品評鑑賞之需，亦可為校勘輯佚之用，更是作家作品得以刊行流佈之依憑。

余寶琳 (Pauline Yu, 1949-) 是北美華裔學者的箇中翹楚，現任美國學會理事會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會長，曾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東亞語言文化系教授，並兼任文理學院院長。余教授早年畢業於哈佛大學，主修現代歐洲歷史與文學且取得學士文憑，後來從史丹佛大學比較文學系完成碩士及博士學位。近二十年來余教授享譽美國漢學界，曾任教過多所知名學府，春風化雨作育英才無數，於北美漢學界舉足輕重。余教授的學術專長是中國古典詩歌的研究，特別是盛唐詩的研究，其學術論著亦頗為多見，主要集中於中國古典詩歌、文學理論和比較詩學方面。余氏早年著有《王維的詩：新譯及評論》(1980)，在美國漢學界有相當不錯的評價。她後來又出版了《中國詩歌傳統中意象的讀法》(1987)，論者以為此書能「擺脫筌蹄，直探驪珠」，從歷史的觀點來檢視詩歌意象的理論、構設和詮釋，有助於我們了解中國古典詩的意象組合及運用。余氏先以英文譯注品評王維的詩歌，對中西象徵主義詩學也有極深入的探討，後來又出版古典詩歌意象讀法的專著，於中西詩學之異同有一通盤的理解，故才能對此議題作雙向的闡發，並試為中西詩學對話求同存異，對中國詩學與西方文論的互照互鑑，頗能彌綸羣言貫通古今。余氏自 2003 年夏榮膺 ACLS 主席，對美國學術團體的研究經費補助規劃，於聯合審議時操管理決策之職，尤致力於提昇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並維繫和強化美國各學術團體間的關係，因此她在學術領導方面備受贊譽。余氏致力於提昇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邇來余氏或獨力完成，或與人合夥編輯成三本有關中國歷史、語言文學與文化的著作，在海外宣揚中華文明不餘遺力，並參與《朗文世界文學選集》(2004) 的編輯工作，對於提高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其貢獻卓著至鉅，其影響力亦頗為深廣。近五年內，余氏在 ACLS 的網站上發表了十餘篇演講稿，論旨大都與美國學會理事會的任務使命、全球化思維的亞洲研究、多元文化觀點的學術管理與自由，以及人文文學與博雅教育有關。在這些講稿中，她從二十一世紀人文學研究的轉化說起，到後網路時代綜合科技影響下的大學教育，均能適切地掌握議題侃侃而談，針砭時弊發語中的，

愈顯其學問識見之淵博精深，允為中西學界之表率。<sup>2</sup>

近二十年來，余寶琳至少寫過六篇英文論文，從中西詩學傳統來詮釋詩歌選本文學現象，這些篇章詳論古典詩詞選集、經典與典律化的相關問題，其中有不少看法發人深省，值得我們在此一一仔細探究。余寶琳認為中國文學選集有助於經典之形成，尤其是詩歌選評與典律化的密切關係，她注意到選評者如何為詩歌定位，亦指出其歷史現象與問題癥結。余氏的幾篇英文論文深入分析此一議題，特別是古代文士怎樣編選詩歌要籍，除了分析古典詩詞的品第和編集，她還曾經過研究詩歌如何典律化，例如文學選評與經典觀，和毛詩注之寓意探討等相關問題。此外，余氏亦撰寫專文探討歷來詞集綜輯編選的諸多問題，特別強調在詞之典律化的過程中，除了注意詞評、詞籍保存與詞作的接受，我們也應當注意詞人怎樣填詞，以及不同的讀者如何讀解詞作。在這幾篇論文中，余氏精研早期中國文學選集與典律生成的複雜過程，也剖析了相關的詩學詞學理論，常於故紙堆中每見新意之闡發，華夏詩學遂得以和西方文論對話匯通，其論詩之精義自有新穎獨到之處。另一方面，余氏亦曾籌辦國際詞學研討會，會中就「關詞之美學特性與形式問題，關於女性問題與社會背景，以及關於詞評、詞籍保存與詞的接受等問題」深入探討。<sup>3</sup>據此學術會議之成果，其後余氏更獨力編輯成《中國（曲子）詞的聲音》（1994）一書，除了卷首導論之外，並撰寫專文探討歷來詞集綜輯編選的諸多問題，特別強調在詞之典律化的過程中，我們應當注意詞人怎樣填詞，以及各式各樣的讀者如何讀解詞作。<sup>4</sup>綜上所述，本文旨在探討中國選本批評、古典詩詞的選評、中國詩詞「經典化」與讀者反應以及余寶琳的中國詩詞典律化研究。

## 貳、中國選本批評

關於中國文學選本的重要性，方孝岳先生曾經指出：「凡是輯錄詩文的總集，都應該歸在批評學之內。選錄詩文的人，都各人顯出一種鑑別去取的眼光，這正是具體的批評之表現。再者，總集之為批評學，還在詩文評專書發生之先。」雖然選本如此重要，但是往往為文評家所輕忽，他接著又說：「研究文學批評的人，往往只理會那些詩話文話，而忽略了那些重要的總集了。其實有許多詩話文話，都是前人隨便當作閑談而寫的，至於嚴立各人批評的規模，往往都在選錄詩文的時候，才錙銖稱量出來。」<sup>5</sup>事隔今日至少有一個多甲子，各式各樣的文學總集、選集或專集不斷地付梓問世，然而在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當中，選本的探討依然受到忽視，相對地，其成果也是較為有限的。但是在

<sup>2</sup> 資料來源：<http://www.acls.org/staf-py.htm>。

<sup>3</sup> 孫康宜著，《晚唐迄北宋詞體演進與詞人風格》，李爽學譯，（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4年），頁269-271。

<sup>4</sup> Pauline Yu, ed., *Voices of the Song Lyric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ix-xxi & 70-103.

<sup>5</sup> 方孝岳著，《中國文學批評·中國散文概論》，（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再版），頁19&20。

另一方面，七十四年前魯迅曾就當時的青年是否須閱讀經典選文，好作為他日文學修養之奠基，談到了中國「選本」的諸多議題，他以《詩經》、《世說新語》、《文選》、《唐人萬首絕句選》、《儒林外史》和《古文觀止》等書為例，鞭辟入裏指出了選本的勢力、影響、作用、方法與侷限，可以供我們思考中國選本批評：

以《古文觀止》和《文選》並稱，初看好像是可笑的，但是，在文學上的影響，兩者卻一樣的不可輕視。凡選本，往往能比所選各家的全集或選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冊數不多，而包羅諸作，固然也是一種原因，但還在近則由選者的名位，遠則憑古人之威靈，讀者想從一個有名的選家，窺見許多有名作家的作品……凡是對於文術，自有主張的作家，他所賴以發表和流佈自己的主張的手段，倒並不在作文心、文則、詩品、詩話，而在出選本。

選本可以藉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見。博覽群籍，採其合於自己意見的為一集，一法也，如《文選》是。擇取一書，刪其不合於自己意見的為一新書，又一法也，《唐人萬首絕句選》是。如此，則讀者雖讀古人書，卻得了選者之意，意見也就逐漸和選者接近，終於「就範」了。

選本所顯示的，往往並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選者的眼光。眼光愈銳利，見識愈深廣，選本固然愈準確。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殺了作者真相的居多。這才是一個“文人浩劫”。

讀者的讀選本，自以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筆的精華的，殊不知卻被選者縮小了眼界……選本既經選者所濾過，就總只能吃他所給與的糟或醜。況且有時還加以批評，提醒了他之以為然，而默殺了他之以為不然處。

評選的本子，影響於後來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還遠在名家的專集之上，我想，這許是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人們也該留意的罷。<sup>6</sup>

從以上所引魯迅的話，我們不難明白他對選本的想法。魯迅從編選的旨趣著眼來區分總集，可歸為採摘精華的總集一類。然亦有務求全備的總集一類，例如《全唐詩》、《全宋詞》和《全元散曲》。要注意選者的意見，亦即選者的文學主張為何，大凡選家操持選政，例皆各有其宗旨，對作品的取捨並非毫無標準。另一方面，讀者閱讀選本難免受選家指揮或控制，甚且於不知不覺中改變自己的文學觀念。最後，談到總集的作用和影響，

<sup>6</sup> 魯迅，〈選本〉，《魯迅作品精華：第三卷》，楊義評選（香港：三聯書店，2001年），頁266-268。

魯迅既肯定總集的作用，也指出總集的侷限所在。另一方面，張伯偉曾為文論及選本的批評形式，他指出選本乃屬於集部總集類，其起源始於摯虞的《文章流別論》，而選本的功能則是網羅眾作與薈萃菁華，在編纂的過程中判定作品之優劣，因此便具有文學批評的價值。張伯偉首先從孔子刪《詩》談起，中間論及《文章流別論》和《昭明文選》的情形，再評議唐人選唐詩與宋代選本的包容性，簡明扼要地論述中國古代文學選本的形成與發展。此外，他亦指出選本的實際影響所在，特別是透過選本文士如何認識文學的形式和內容，以及選家怎樣用選本批評的方式來闡釋自己的文學主張。最後，他則談到選本在域外漢文學傳播中的影響力，主要以韓國和日本的情形為例加以說明，對於美國的選本與漢文學的傳播亦不無啟發。<sup>7</sup>

在中國文學史上「選本」的存在由來已久，「選本」的觀念產生於漢代，而中國古代「選本」的權輿之作是《文選》一書，歷經了從“集”文到“選”文的階段，它可以說是一種文學批評的方式。鄒雲湖在《中國選本批評》一書裏，也說選本這種文學批評方式，其批評作用主要體現於下列三方面：「（一）選本具有巨大的批評價值；（二）選本具有自身的批評機制；（三）選本自身還有著極其豐富、多樣、靈活的批評方式。」<sup>8</sup>從中國歷代的選本來看，像這種頗具傳統特色的批評方式，經常可見於各式各樣的詩話詞話和小說戲曲評點，而其所展現的文學批評價值便是論者指出的下列三點：「（一）選本的去取標準，反映了選錄者的文學思想和批評觀念；（二）選本中所附的批點箋註，從字句的訓釋到文意的闡發，表現出批評方法上的靈活性與多樣性；（三）選本、選評本的批評價值，突出地表現在促進文學作品的流傳上。」<sup>9</sup>不可諱言，古代文學選家的目光如炬，在選本中讀者可以看到他們的美學主張，因此選本的存在價值、作者在選本中的地位和讀者所受選本之影響，也往往全繫於選家之手。選家操持選政相當不易，他們為什麼選、又選些什麼，以及到底如何選就成為問題癥結所在了。<sup>10</sup>

中國古典文學的鑑賞向來有自己的傳統，它的獨特之處乃在於強調傳釋者的直觀、印象和評點，偏重讀解人的感受、悟性和啟示，與西方文論體系所崇尚的邏輯分析和演繹歸納精神，在鑑賞方法上自然是極為不同的。中國古代文學的鑑賞律法常得自作家學者，這些文人既有足夠的文學知識修養，也有較高的審美能力，以及豐富的創作經驗，他們往往能用片言隻語顯示作者的人格、情趣、才華和文筆，也可以在尺幅之內表現出他們對字詞與聲吻的特別感受。劉勰於《文心雕龍》〈知音〉篇論及：「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岳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吠瀟。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sup>11</sup>元好問也曾經說過：「工詩

<sup>7</sup> 張伯偉著，〈選本論〉，《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277-325。

<sup>8</sup> 鄒雲湖著，《中國選本批評》，（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頁1-11。

<sup>9</sup> 賴力行著，《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1998年），頁235-239。

<sup>10</sup> 鄒雲湖著，《中國選本批評》，（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頁285-291。

<sup>11</sup> 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1》，（上海：上海古籍，2001年），頁300。

與工文，大似國手棋。國手雖漫應，一着存一機。不從着着看，何異管中窺。文須字字作，亦要字字讀。咀嚼有餘味，百過良未足。」<sup>12</sup>選家如欲求「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當然得博觀典籍英華，必須超越個人的愛憎輕重，在編選的過程當中，以個人宏觀的眼力、理論的素養和史家的氣魄，來綜輯詞藻錯比文華。選家善盡選政之職責，引導讀者進入鑑賞的過程，其餘的事恐怕就得留給讀者來完成，要尊重讀者個人的審美能力。

根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總集之所以產生及其作用，乃是因為：「文集日興，散無統紀，於是總集作焉：一則網羅放佚，使零章殘什並有所歸；一則刪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是固文章之衡鑒，著作之淵藪矣。」<sup>13</sup>中國選本批評之原理值得斟酌參詳，因為藉此可以我們了解任何文學選集成書的緣由及考量。首先，就選者與選本而言，前賢曾有如下的看法：“選者之權力能使人歸”、“雖選古人詩，實自著一書”、“作者難，而操選政為尤難”。論者次就作者在選本中的地位以觀之，謂選本中的作者不啻為“動物園裏的動物”，其處境毋寧是相當尷尬被動的。最後，文評家再從讀者與選本的關係來論說，指出“刪詩之意即讀詩之意”。<sup>14</sup>中國選本批評的傳統源遠流長，大致說來，元明時期的文學總集編纂有五種類型：「或輯錄搜遺，或推廣主章，或張大聲勢，或標新立異，或消遣贏利。」<sup>15</sup>這些文學選本除了有文獻參考的價值之外，也還具備理論與實用的價值。實際上，中國古典文學選本的主要構成部分有三：選本的序跋、選本的入選作品以及選本的批注和評點，而選本的文學批評價值也就反映在其中了。對讀者而言，選本的序跋具有指引的作用，舉凡選本的成書經過、選家的生平交游、師承淵源和文學思想，都可以在序跋部分裏窺見箇中消息。許多中國古典文學選本的序跋都具有文學批評價值，例如蕭統的《文選〈序〉》、徐陵的《玉臺新詠〈序〉》、殷璠的《河嶽英靈集〈序〉》、歐陽炯的《花間集〈序〉》等，就在這些序跋文的短論中，選家的美學主張反映於字裡行間。

二十幾年前思果先生論及選本的作用，他曾經有過這樣精采的按語：「書有選本，等於人民有代表；書太多，所以要選來讀；人太多，所以要推代表，才好辦事。選本未必叫人滿意，代表亦然。不過這兩樣都少不了，我們只好妥協。」<sup>16</sup>我們的生涯相當有限，無法盡讀天下的典籍書冊，若果有了好的選本，即便未能管窺蠡測文苑英華，卻也可以嘗鼎一臠，稍解知識上的饑渴，故此，各式各樣的選本向來十分盛行。另一方面，選本也有其指南導引的功能，思果又說：「選本有的選整篇，有的摘錄最精采的章節，甚至摘句。我以為供欣賞用固然可以揀精金鑽石，供學習用必須整篇才行。有的文家的文

<sup>12</sup> 參見元遺山〈與張仲傑郎中論文詩〉。

<sup>13</sup> 參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六集部三十九總集類一。

<sup>14</sup> 鄒雲湖著，《中國選本批評》，（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頁282-317。

<sup>15</sup> 郭英德等著，《中國古典文學接受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443-456。

<sup>16</sup> 蔡濯堂（思果），〈選本〉，《啄木集》，（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85年），頁116。



章不宜於摘錄，要看完全篇才見其長，如果專選警句，把他漏掉，就可惜了。」<sup>17</sup>凡此種種，皆為選本之勝處；然而，選本亦有其顯著的缺失，一是卷帙之容量實在有限，不可能囊括典籍英華，定然有滄海遺珠之憾；二來選家難免有一己之偏嗜，其所採摭者未必是讀者以為精妙之品。即便有不足之處如上述，選家毋庸自責，編者操選政自有主張，讀者披閱選本亦須取捨。除此之外，思果亦指出：「很多選本是另一種形式的文學史。一方面把作者的生平寫成短短的評傳，詳細說出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所受別人的影響和對別人的影響，再附他的作品。」<sup>18</sup>選本可說是一部活的文學史，既有選文足式典範，亦不乏評語可供參考，讓我們品嘗文章之佳妙，也能知其義法精奧之所在。我們於披覽詞章時，如能參照文學史，以為選文閱讀之指南，自然可以增長見識開拓視野，甚且培養一己之文學品味與寫作能力。

關於選本在文學史形塑的過程中，其所扮演的中介角色和展現的動力結構，王鍾陵就指出「總集往往構成文學史發展的契機」，乃因總集之編纂常能「影響一代風氣與確立一種美學傳統。」<sup>19</sup>衡諸中國歷代各式各樣的文學選本，選家個人的美學情趣和理念蘊含其中，經由這些大大小小的總集或選集來開拓審美風氣，進而引領一代人的文學閱讀方向。因此，選家編輯文學總集不但可以樹立特定美學旨趣的大纛，也可以穿越不同的時空散播美學思想形塑傳統，最終能影響到文學史流派的誕生。<sup>20</sup>另一方面，就編輯的體例而言，選家可以按照正文、作者、題解及注釋四類編次，在題解部分應該交待原文出處、文章要旨、時代背景與文學價值。我們都知道大規模的選本，其實還可方便讀者查閱，就像《諾頓英國文學選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收錄了數以千計的篇章，英國文學史上許多的作家作品悉已囊括入書，應該是可以滿足一般讀者的需求。儘管如此，任何一種選本畢竟有其侷限，在取材、編次或格式上都無法盡善盡美，對此編輯策略的問題，思果則說：

選本不能盡如人意，其實人人有自己的選本。選本是不學的人的恩物、入門書，也是學者枕邊的消遣書，平時的便覽。選家要有眼光、學問，不是人人拿把剪刀，找幾本書來剪一剪就可以出書的。選古人的文章還省事，因為那些人地位多少已經奠定，而且都死了，不會說話。選今人的文章問題很多。<sup>21</sup>

其實許多的選集更顯現出編者個人的文學癖好，所選錄的作品未必就是經典之作，「青菜蘿蔔各有所好」，文學品味原也是無可商量的事。由此可見，操選政的確不容易，

<sup>17</sup> 蔡濯堂，〈選本〉，《啄木集》，(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85年)，頁119。

<sup>18</sup> 蔡濯堂，〈選本〉，《啄木集》，(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85年)，頁120-121。

<sup>19</sup> 王鍾陵著，《文學史新方法論》，(台北：文史哲，2003年)，頁267-300。

<sup>20</sup> 王鍾陵著，《文學史新方法論》，(台北：文史哲，2003年)，頁270-279。

<sup>21</sup> 蔡濯堂，〈選本〉，《啄木集》，(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85年)，頁122。

特別是大規模的文學總集。雖然如此，任何的文學選集或多或少有助於經典的形成，因為在這些不同的選本之內，除了個人特殊的癖好之外，更能反映出選家的價值判斷，和編輯者所習染的時代文風。三十幾年前，李又安（Adele Austin Rickett）曾撰一文〈作為文學批評者的中國選家〉（*The Anthologist as Literary Critic in China*），談到選集編纂的早期歷史，挑選作為一種批評的形式，以及選集中箋注的角色等，旁徵博引中西詩學著作，立論也精闢詳實，確實值得我們參考。<sup>22</sup>

選本與編者的關係已如上述，且讓我們來看看作者與選本的關係又是如何。另一方面，當論及中國選本批評原理時，余寶琳曾經引用詩人 David Antin 的話來說明作者與選本的關係：「選集之於詩人猶如動物園之於動物」<sup>23</sup>，作者側身于文苑詩海，其篇章究竟何時得見天日以及如何展現，皆操之於“動物園”的主人—選家之手。余寶琳認為早期中國文學的選集與經典關係至為密切：

（一）中國經典形成的原動力，大多數選集受制於相互關聯的一些目的，而其中頭等重要且最為明顯的是價值判斷；（二）選集，就如經典自身，不僅被視為文化範例的儲藏，甚至更具體地被視為歷史的作品；（三）選集不僅通過對作品的取捨，而且也通過對個人作品的闡釋來確立經典；（四）在中國選集的編輯與目錄學與文類的討論緊密地聯繫在一起。<sup>24</sup>

關於中國古代文學典律化的過程，余寶琳首先是從早期中國文學選集與經典形成的密切關係，來探討中國古典詩歌的定位問題，指出其歷史現象與問題癥結所在，所論切中肯綮發人深省。除此之外，余氏切入中國古典詩歌的定位問題，特別注意到古代文士如何編選詩歌要籍，她除了分析古典詩詞的品第和編集，也曾經過研究詩歌的典律化過程，例如早期中國文學的選集與經典、毛詩注的寓意探討以及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的詩學理論等議題，常於故紙堆中每見新意之闡發，華夏詩學與西方文論咸能對話匯通，論詩之精義自有其獨到處。另一方面，余氏亦曾籌辦過國際詞學研討會，會中就「詞之美學特性與形式問題，關於女性問題與社會背景，以及關於詞評、詞籍保存與詞的接受等問題」深入探討。<sup>25</sup>據此學術會議之成果，其後余氏更獨力編輯成《中國（曲子）詞的聲音》（1994）一書，除了卷首導論之外，並撰寫專文探討歷來詞集綜輯編選的諸多問題，特別強調在詞之典律化的過程中，我們應當注意詞人怎樣填詞，以及各式各樣的讀

<sup>22</sup> Adele Austin Rickett, "The Anthologist as Literary Critic in China,"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 19 (1975): 146-165.

<sup>23</sup> 余寶琳著、曹虹譯，〈詩歌的定位—早期中國文學的選集與經典〉，《北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樂黛雲、陳珏編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254。

<sup>24</sup> 余寶琳著、曹虹譯，〈詩歌的定位—早期中國文學的選集與經典〉，頁258-260。

<sup>25</sup> 孫康宜著，《晚唐迄北宋詞體演進與詞人風格》，李爽學譯，（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4年），頁269-271。

者如何讀解詞作。<sup>26</sup>儘管就時代背景、歷史文化與編輯理念而言，西方的文學選集與中國的不盡然相同，但兩大傳統所遺留下來的典籍汗牛充棟，成千上萬的篇章又該從何挑起，顧此一定會失彼，任何選家都很難面面俱到，所以理想的選集應是不存在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選集，其文學圖繪容或各有所偏，但畢竟也曾為其時代造像，直接參與文學典律的對話，因為在傳統中國，難以數計的各種文學選集，其實就是這種典律化過程中的主要媒介和表達方式。<sup>27</sup>

## 參、古典詩詞選評

在許多中國古代的文學選集中，編者非惟透過選錄作品來展露自家的去取眼光，甚且於選本內常常附以序文和評語，直接了當地表達個人的文學觀點，因此，後世研究文學批評或詩學理論者，往往針對這些著名的選集仔細參詳，期能找出箇中的編選標準和詩學觀念。唐宋人編輯的唐宋詩詞選本實在不少，流傳至今較為著名的也有幾十種之多，如果我們能就這些重要的選本加以觀察其間的異同，或許可以幫助我們重新認識某些詩人及其作品在文學史上的真正價值所在。這些詩詞選集的產生是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的重要現象，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選家的審美旨趣和去取標準，同時也能夠窺見編者置身其中的時代風尚，它們既可供品評鑑賞之需，亦為校勘輯佚之用，更是作家作品得以刊行流佈之依憑。在中國傳統圖書的四部分類之中，選集從屬於總集，選家「網羅放佚，使零章殘什，并有所歸」，就文學的典律生成而言，這些編者於操選政之際便參與了歷史的對話，對詩歌作品的刪汰繁蕪，自有其獨特的品評定見，他們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終乃搜集而成淵藪，畢竟揀擇以顯衡鑑，因此在詩學批評方面頗具價值。

### 一、唐詩選評研究

民國以前重要的唐詩選集非常多，在這些數以百計的版本當中，也有不少流傳久遠、膾炙人口的選本，為後世研究唐詩及其詩學者所推重。選錄唐詩，始於唐代，迄有清一朝，至少有六百餘種，現在可考知的唐人選唐詩，也有五十種之多，而保存至今的就有十幾種。一般的唐詩研究論著大都就作品或史料來論述，也有取材自後人的詩話或文集來品評，而孫琴安卻認為從唐詩選本的角度來研究唐詩，其實也是非常重要的，他指出四個我們需要思索的問題，文章雖然較長，但是值得我們花費點篇幅，加以歸納整理，以為唐詩選評研究之參考：

（一）我國古代許多著名的文學家，都曾編選、批校或評注過唐詩選本至於為唐

<sup>26</sup> Pauline Yu, ed., *Voices of the Song Lyric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ix-xxi & 70-103.

<sup>27</sup> 余寶琳著、曹虹譯，〈詩歌的定位—早期中國文學的選集與經典〉，頁 255-256。

詩選本作序題跋者，更是不計其數。我們從中可以看出他們對唐詩的看法和態度，這無論是對於研究這些文學家本身，還是研究唐詩在各個時期對文學的影響，都具有莫大的意義。尤其可貴的是，有些作家為唐詩選寫的序文，在他本人的文集中已不見記載，只有在選本本身中才能找到。這無疑都是我們研究唐詩和這些作家的寶貴資料。

- (二) 許多唐詩選本不僅有序，而且又有凡例或總論，批語或評點，不少選家的評語，都言簡意賅，不蹈前人，有感而發，十分精彩。如果我們把這些書中的評語搜集起來，本身就是一本本很好的詩話。我們只有將詩話和選本兩者結合起來考察，才能比較全面地了解這個作家對唐詩的看法，也才能知道歷代研究唐詩的總體情況。
- (三) 我們從每種唐詩選本的選目上，可以看出這個編者的基本傾向。而每個詩人或者這個詩人的某一詩體，在後世各個朝代的昇降起伏和興衰起落，也可以從唐詩選本中看得一清二楚。
- (四) 後代許多詩評家對唐詩的一些重大爭論，有時並不是在詩話中進行，而是在選本中進行的，這些情況在他們的詩話中都沒有得到充分的反映，全都是由選本告訴我們的。凡此，都說明了唐詩選本對唐詩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sup>28</sup>

唐五代是中國詩歌的黃金時代，不特詩學發達，詩集亦十分盛行，當時人所編的詩歌選集亦紛紛出籠。明代胡震亨的《唐音癸籤》卷三一載有唐五代人所編選之唐詩，已有三十多種，較為後世熟知的就有下列十種：佚名《唐寫本唐人選唐詩》、元結《篋中集》、殷璠《河岳英靈集》、芮挺章《國秀集》、令狐楚《御覽詩》、高仲武《中興間氣集》、姚合《極玄集》、韋莊《又玄集》、韋穀《才調集》、佚名《搜玉小集》。以上這些選本是唐詩繁盛的產物，而編者在選詩時大都有他們特殊的考量。根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御選唐詩》，編者通常透過總集的評選方式，具體呈現個人之性情稟賦與人品學識：

詩至唐，無體不備，亦無派不有，撰錄總集者，或得其性情之所近，或因乎風氣之所趨，隨所撰錄，無不可各成一家。故元結尚古淡，《篋中集》所錄皆古淡；令狐楚尚富瞻，《御覽詩》所錄皆富瞻；方回尚生拗，《瀛奎律髓》所錄即多生拗之篇；元好問尚高華，《唐詩鼓吹》所錄即多高華之製。蓋求詩於唐，如求材於山海，

<sup>28</sup> 孫琴安著，《唐詩選本提要》，上海：上海書店，2005年，頁1-20。

隨取皆給。而所取之當否，則如影隨形，各肖其人之學識。自明以來，詩派屢變論唐詩者亦屢變，大抵各持偏見，未協中聲。<sup>29</sup>

選家各有情性學識，其所處時代風氣亦異，罕能有持平之論，去取刪存繫於一念，不免囿於其知見蔽障，而無法超越拘限全然客觀，因此也就很作到難執兩用中。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幾種唐詩選本的序文或跋語，從中探討這些選家如何追求詩選的理想典範，特別是他們選詩的觀念和方法有什麼異同，以便我們對唐代詩學的深入理解，而有助於分析傳統詩歌如何典律化。<sup>30</sup>就在這些詩選集的序跋中，我們不難看到編者的文學觀、詩歌史觀、編選宗旨、去取標準等等，而這些評語可說是選家對詩人的深入理解，和對詩作精華意蘊之品評，實在頗具詩學批評的價值。

### 1. 殷璠《河嶽英靈集》

殷璠的《河嶽英靈集》允為唐人選唐詩的翹楚之作，對後來各式各樣的詩選集影響相當深遠，尤其甚者，在唐詩典律化的過程中，此作具有文學典範的意義，值得我們好好仔細研究。《河嶽英靈集》的原序：

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有雅體、野體、鄙體、俗體。編紀者能審鑑諸體，委詳所來，方可定其優劣，論其取舍。至如曹、劉詩多直語，少切對，或五字並側，或十字俱平，而逸駕終存。然挈瓶庸受之流，責古人不辨宮商徵羽，詞句質素，恥相師範。於是攻異端，妄穿鑿，理則不足，言常有餘，都無興象，但貴輕艷。雖滿筐筍，將何用之？自蕭氏以還，尤增矯飾。武德初，微波尚在。貞觀末，標格漸高。景雲中，頗通遠調。開元十五年後，聲律風骨始備矣。實由主上惡華好樸，去偽從真，使海內詞場，翕然尊古，南風周雅，稱闡今日。璠不揆，竊嘗好事，願刪略群才，贊聖朝之美，爰因退跡，得遂宿心。粵若王維、昌齡、儲光義等二十四人，皆河嶽英靈也，此集便以《河嶽英靈集》為號。詩二百三十四首，分為上下卷，起甲寅，終癸巳。倫次於敘，品藻各冠篇額。如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權厭梁、竇，終無取焉。<sup>31</sup>

根據王運熙和楊明的研究，此序觸及了幾個重要的問題：（一）書名《河嶽英靈》意謂祖國河山所孕育的英俊詩才；（二）詩集的卷數分上下兩卷，共錄二百三十四首；（一）選詩起迄年代為起甲寅，終癸巳，所收作家皆處於開元、天寶時代；（四）品評

<sup>29</sup> 參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御選唐詩》，卷一百九十。

<sup>30</sup> 有關唐詩選本的歷史發展，請參閱賀嚴著，《清代唐詩選本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1-9。

<sup>31</sup> 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67。

詩人詩作的標準，有以下五項：重奇、重雅、重風骨、重興象、重自然聲韻。<sup>32</sup>選本有選家的評語，是殷璠的創舉，他的選篇和評論都頗為篤實精當，也因此獲得後人好評，而殷璠此集最發人深省的地方，便是以風骨、聲律論盛唐詩的特色。殷璠撰有〈河嶽英靈集集論〉，闡明他的詩歌審美理想：

論曰：昔伶倫造律，蓋為文章之本也。是以氣因律而生，節假律而明，才得律而清。預於詞場，不可不知音律焉。孔聖刪詩，非代議所及。自漢、魏至於晉、宋，高唱者十有餘人；然觀其樂府，猶有小失。齊梁陳隋，下品實繁，專事拘忌，彌損厥道。夫能文者，匪謂四聲盡要流美，八病咸須避之，縱不拈綴，未為深缺。即“羅衣何飄飄，長裾隨風還”，雅調仍在，況其他句乎。故詞有剛柔，調有高下，但令詞與調合，首末相稱，中間不敗，便是知音。而沈生雖怪曹，王曾無先覺，隱侯去之更遠。璠今所集，頗異諸家，既聞新聲，覆曉古體，文質半取，風騷兩挾，言氣骨則建安為傳，論宮商則太康不逮。將來秀士，無致深憾。<sup>33</sup>

就現存的選本而言，此書乃為最早標舉一家宗旨者，對後世唐詩選本有相當大的影響，雖則其所標舉之宗旨不無偏差，但畢竟也代表某一種詩歌流派的傾向。殷璠的選詩標準為：「既聞新聲，覆曉古體，文質半取，風騷兩挾，言氣骨則建安為傳，論宮商則太康不逮。」<sup>34</sup>

## 2. 芮挺章《國秀集》

芮挺章的《國秀集》，也是盛唐詩的選本，此集共選錄作者九十人，詩二百二十首，分為三卷，集內並無任何評語，只有挺章友人樓穎為之撰序，略述其編選是書之因緣始末。《國秀集》的編輯體例不很明確，想必是與此書並非成於一人之手有關。此集前有序，全以人繫詩，大致上以時間和官職為先後來安排，而選詩的標準就是「可批管弦者」，主要收錄那些音律和諧、可以配合樂曲的詩。雖然此集所選錄之詩，與開天詩壇之風貌頗有距離，但是從樓穎的序文裏，我們可以了解到《國秀集》的編選宗旨和標準，其原序如下：

昔陸平原之論文，曰「詩緣情而綺靡」。是彩色相宣，煙霞交映，風流婉麗之謂也。仲尼定禮樂，正雅頌，采古詩三千餘什，得三百五篇，皆舞而蹈之，絃而歌之，亦取其順澤者也。近祕書監陳公，國子司業蘇公，嘗從容謂芮侯曰：「風雅之後，

<sup>32</sup> 王運熙、楊明著，《中國文學批評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237-248。

<sup>33</sup> 周祖謨編選，《隋唐五代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頁144-145。

<sup>34</sup> 周祖謨編選，《隋唐五代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頁144-145。

數千載間，詞人才子，禮樂大壞。諷者溺於所譽，志者乖其所之，務以聲折為宏壯，勢奔為清逸。此蒿視者之目，聒聽者之耳，可為長太息也。運屬皇家，否終復泰。優游闕里，唯聞子夏之言，惆悵河梁，獨見少卿之作。及源流浸廣，風雲極致，雖發詞遣句，未協風騷，而披林擷秀，揭厲良多。自開元以來，維天寶三載，譴謫蕪穢，登納菁英，可被管絃者都為一集。」芮侯即探書禹穴，求珠赤水，取太冲之清詞，無嫌近溷；得興公之佳句，寧止擲金。道苟可得，不棄於廝養；事非適理，何貴於膏粱。其有巖壑孤貞，市朝大隱，神珠匿耀，剖巨蚌而寧周，寶劍韜精，望斗牛而未獲，目之縑素，有愧遺才。尚欲巡采風謠，旁求側陋，而陳公已化為異物，堆案颯然，無與樂成，遂因絕筆。今畧編次，見在者凡九十人，詩二百二十首，為之小集，成一家之言。<sup>35</sup>

### 3. 元結《篋中集》

元結的文藝思想是主張復古的，回歸漢魏比興風雅的詩歌傳統，而編選《篋中集》就是他在詩歌方面的具體實踐。元結認為當時的詩歌「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為詞，不知喪於雅正」。因此，他極力推崇沈千運和孟雲卿等七人的五言古詩，遂將其篋中所集二十四首，編為一卷，用以傳之親故。其原序云：

元結作《篋中集》成，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訂之？」對曰：「風雅不興，幾及千歲，溺於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名位不顯，年壽不將，獨無知音，不見稱顯，死而已矣，誰云無之。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為詞，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咏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污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今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聽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吳興沈千運，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攘於己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為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效，能侶類者，有五六人。嗚呼！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異於是者，顯榮當世。誰為辨士，吾欲問之。天下兵興，於今六歲。人皆務武，斯為誰嗣？已長逝者，遺文散失，方阻絕者，不見近作。盡篋中所有，總編次之，命曰《篋中集》，且欲傳之親故，冀其不忘於今。凡七人，詩二十四首。時乾之三年也。<sup>36</sup>

### 4. 高仲武《中興間氣集》

唐人選唐詩的另一代表作《中興間氣集》，為高仲武所編選，或有訛誤題為孟彥深編選。高仲武，渤海(今山東濱縣)人。生卒年與字號皆不詳，著有詩集兩卷。此集選錄

<sup>35</sup> 周祖謨編選，《隋唐五代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頁141-142。

<sup>36</sup> 周祖謨編選，《隋唐五代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頁125-126。

唐肅宗至德初(756)到唐代宗大曆末(779)二十餘年間之作家作品，計 26 人，詩 130 多首。因為舊史家稱此一時期為安史亂後的“中興”之世，故乃有此書名。這部選集大致反映出至德、大曆間詩壇的主要風貌。編選者相當推崇錢起、郎士元的詩，把他們兩人列為上、下卷之首。此集所選多為贈別酬和、流連光景之作，間亦有少數篇什反映民生疾苦。在藝術風格上，泰半詩人追求清逸幽遠的境界，詩之體制多為五言。高仲武在〈自序〉中提出“體狀風雅，理致清新”的選詩標準，應合了當時文壇的風氣。此書在每家姓氏之後，都有簡短的評語，其中不也乏精闢的見解。高仲武如此闡釋他的詩學中心思想、選詩的標準和體例範圍：

詩人之作，本諸於心，心有所感而形於言。言合典謨則列於風雅，暨乎梁昭明，載述已往，撰集者數家，推其風流，正聲最備，其餘著錄，或未至焉。何者？《英華》失於浮游，《玉臺》陷於淫靡，《珠英》但紀朝士，《丹陽》止錄吳人。此曲繇學專門，何暇兼包眾善，使夫大雅君子，所以對卷而長嘆也！

唐興一百七十載，屬方隅叛渙，戎事紛淪，業文之人，述作中廢。粵若肅宗、先帝，以殷憂啟聖，反正中原。伏惟皇帝，以震繼明，保安區宇。國風雅頌，蔚然復興；所謂文明御時，上以化下者也。仲武不揆菲陋，輒罄搜聞，博訪詞林，采察謠俗。起自至德元首，終於大曆暮年。作者數千，選者二十六人，詩總一百三十二首，分為兩卷，七言附之。略敘品彙人倫，命曰《中興間氣集》。

且夫微言雖絕，大制猶存，詳其否臧，當可擬議。古之作者，因事造端，敷弘體要，立義以全其制，因文以寄其心，著王政之興衰，表國風之善否，豈其苟悅權右，取媚薄俗哉！今之所收，殆革前弊。但使體狀風雅，理致清新，觀者易心，聽者竦耳，則朝野通取，格律兼收。自鄙以下，非所敢隸焉。凡百君子，幸詳至公。<sup>37</sup>

##### 5. 令狐楚《御覽詩》

令狐楚的《御覽詩》，此書尚有其他別名：《唐歌詩》、《選進集》、《元和御覽》。此集乃令狐楚於唐憲宗時，奉勅編進。《御覽詩》一卷，收錄三十人，共有二百八十九首，全是近體律絕，詩風“研豔”。此書乃奉敕編纂，編輯需考量皇帝對詩歌的偏愛和審美趣味，因此本集所反映的就不只是令狐楚個人的詩觀，同時也具體呈現出皇家的喜好。就詩歌的體裁而言，令狐楚所選全部是近體，尤其偏重五律和七絕，五言詩的比例調降，而七言詩的比例增多，於此可見唐人詩歌創作風氣的改變，由重古體轉移至重近體的轉

<sup>37</sup> 周祖謨編選，《隋唐五代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頁149-150。



移趨勢。《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

蓋猶古本所錄，惟韋應物為天寶舊人，其餘李端、司空曙等，皆大曆以下人。張籍、楊巨源並及於同時之人，去取凡例，不甚可解。其詩惟取近體，無一古體，即〈巫山高〉等之用樂府題，亦皆律詩。蓋中唐以後，世務以聲病諧婉相尚，其奮起而追古調者，不過韓愈等數人。楚亦限於風氣，不能自異也。本傳稱楚於賤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傳誦。……故此集所錄，如盧綸送道士詩：〈駙馬花燭詩〉、〈鄭縱邯鄲俠少年詩〉、〈楊凌閣前雙槿詩〉皆頗涉俗格，亦其素習然也。然大致雍容諧婉，不失風格，上比篋中集則不足，下方才調集則有餘，亦不以一二疵，累棄其全書矣。<sup>38</sup>

雖然令狐楚進呈《御覽詩》得顧及唐憲宗的好尚，但他同時也掌握住當下詩壇的基本面貌，正所謂「詩到元和體變新」，那時都城詩人無不醉心於“新律詩”。基本上，《御覽詩》主要追述大曆詩風，而十才子乃特重音韻清脆流轉，多寫花態閨情的詩歌，風格上講究細膩綿軟，詩作便於歌妓演唱，有的也融入僧禪妙理，引人深思。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言，令狐楚此集所錄者，大抵皆是「雍容諧婉」，於風雅詩旨雖不能與《篋中集》相較，但與《才調集》相較則不遑多讓，由是可知選家的詩歌審美趣味所在了。<sup>39</sup>

## 6. 姚合《極玄集》

姚合的《極玄集》是現存較完整的一種唐人選唐詩，他選詩的重點就是要表現五言詩的音韻格律、章法結構和語言技巧，並不要求詩作有道德教化的深意。此書所錄作品之題材，大都是送別贈答、思鄉懷古、閒適題詠，和極少數反映民生現實的歌詩。《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

極玄集二卷，唐姚合編。合有詩集，已著錄。合為詩，刻意苦吟，工于點綴小景，搜求新意，而刻畫太甚，流于纖仄者，亦復不少。宋末江湖詩派皆從是導源者也，然選錄是集，乃特有鑒裁，所取王維至戴叔倫二十一人之詩，凡一百首，今存者凡九十九，合自稱為詩家射雕手，亦非虛語。<sup>40</sup>

極玄之名，應當是出於《老子》：「玄之又玄，眾妙之門。」姚合的〈極玄集自序〉也簡要地敘述其選詩標準：「於眾集中更選其極玄者，庶免後來之非。」然而姚武功並未對此再作詳解，我們如欲探究其選詩標準，可將是書與《中興間氣集》比觀，便

<sup>38</sup> 參閱《御覽詩》，「四庫全書電子版」，集部八，總集類，（上海：人民出版社）。

<sup>39</sup> 參閱《御覽詩》，「四庫全書電子版」，集部八，總集類，（上海：人民出版社）。

<sup>40</sup> 參閱《極玄集》，「四庫全書電子版」，集部八，總集類，（上海：人民出版社）。

不難明白其審美旨趣了。高仲武只選「體狀風雅，理致清新」的大歷詩人之作，但是姚合在去取篇章時，則更強調一種詩中所呈現出孤寂的情境，和詩筆上一種清幽淡遠的細緻刻畫。此外，蔣易的〈極玄集序〉一文亦盛贊姚秘監「去取之法嚴，選精選之精」，並與其他唐詩選本比較，凸顯其選詩體例之特色：

唐詩數千百家，浩如淵海，姚合以唐人選唐詩，其識鑒精矣。然所選僅若此，何也？蓋當是時以詩鳴者人有其集，製作雖多，鮮克全美，譬之握珠懷璧，豈得悉無瑕類者哉。武功去取之法嚴，故其選精選之精，故所取僅若此。宋初詩人猶宗唐，自蘇、黃一出，唐法幾廢。介甫選《唐百家》，亦惟據宋次道所有本耳。《又玄》、《粹苑》，世已稀覯，況其他乎？易嘗采唐人詩幾千家，萬有餘首，視此有愧。蓋憫作者之苦心，悼後世之無聞，故凡一聯一句，可傳誦者，悉錄不遺，亦不以人廢，固知博而寡要，勞而無功，知我罪我，一不敢計，業欲並錄諸粹，而力有未逮，姑先此集與言詩者共之。時重紀至元之五年三月既望建陽蔣易題。<sup>41</sup>

## 7. 韋莊《又玄集》

晚唐五代詩人韋莊亦有唐詩選集《又玄集》傳世，在序文中闡明他的基本詩學觀念，表面看來他是因襲姚合的《極玄集》，但簡化了姚合的書名「玄」字之義，只單取「妙」的詩學意涵。綜觀此書，自初唐至晚唐，有代表性之名詩人悉盡收入，選家不無總結一代詩風之意。從《又玄集》的選目來看，我們知道「清詞麗句」是韋莊選詩的唯一標準，但是他的眼界則較姚合更為開闊，不拘限於清淡玄遠之什，舉凡情深意摯、辭句調諧與撩人思絮的作品，都在《又玄集》的搜集之列：

謝玄暉文集盈編，止誦「澄江」之句；曹子建詩名冠古，唯吟清夜之篇。是知美稼千箱，兩岐爰少；繁弦九變，大濩殊稀。入華林而珠樹非多，閱眾籟而紫簫惟一。所以擷芳林下，拾翠岩邊，沙之汰之，始辨辟寒之寶；載雕載琢，方成瑚璉之珍。故知領下採珠，難求十斛；管中窺豹，但取一斑。自國朝大手名人，以至今之作者，或百篇之內，時記一章；或全集之中，唯徵數首。但掇其清詞麗句，錄在西齋；莫窮其巨脈洪瀾，任歸東海。總其記得者，才子一百五十人；誦得者，名詩三百首。長樂暇日，陋巷窮時，聊撼膝以書紳，匪攢心而就簡。此蓋詩中鼓吹，名下笙簧，擊鳧氏之鐘，霜清日觀；淬雷公之劍，影動星津。雲間分合壁之光，海上運摩天之翅。奪造化而雷雲噴湧，役鬼神而風雨賓士。但思其食馬留肝，徒云染指；豈慮其烹魚去乙，或致傷鱗。自慚乎臄腹易盈，非嗜其熊蹯獨美。然而律者既采，繁者是除，何知黑白之鵝，強識淄澠之水。左太沖十年三賦，未必

<sup>41</sup> 參閱《極玄集》，「四庫全書電子版」，集部八，總集類，（上海：人民出版社）。

無瑕；劉穆之一日百函，焉能盡麗。是知班、張、屈、宋，亦有蕪辭，沈、謝、應、劉，猶多累句。雖遺妍可惜，而備載斯難。亦由執斧伐山，止求佳木；挈瓶赴海，但汲甘泉。等同於風花煙月，各是其櫨梨橘柚。昔姚合撰《極玄集》一卷，傳於當代，已盡精微，今更采其玄者，勒成《又玄集》三卷。記方流而目眩，閱麗水而神疲，魚兔雖存，筌蹄是棄。所以金盤飲露，唯采沆瀣之精；花界食珍，但響醍醐之味。非獨資於短見，亦可貽於後昆。采實去華，俟諸來者。時光化三年七月日。<sup>42</sup>

### 8. 韋穀《才調集》

韋穀的《才調集》是唐詩選諸作中卷帙最浩繁的，共有十卷，選詩一千首，從盛唐至唐季之詩人皆收。在體裁上，以律詩為多，兼收古體歌行。所錄各家詩作數量不一，差距頗大，以韋莊的 63 首為最多，溫庭筠的 61 首次於，其他不少詩人僅錄一首，於此我們不難發現選家的眼光。韋穀選詩以中、晚唐風格穠麗者為重，講究工麗的詩歌語言，和纖靡的題材內容，特別對歌詠豔情和婦女生活的詩作垂愛有加。故此集所錄作品大抵韻高詞麗，按入選詩作數量多寡，前五名詩人為：韋莊、溫庭筠、元稹、李商隱、杜牧。韋穀選詩，獨標才調，因為晚唐文士喜用近體歌詠豔情，並且認為如此方能表現出詩人的才調，而選家「自樂所好」，因此超越儒家的詩教觀念，特別偏愛那些能反映作者個人才情的詩篇。此外，雖然韋穀曾明言「閱李、杜集」，但是書中卻未選杜甫的詩作，不知原因何在。其原序云：

余少博羣言，常取得志。雖秋螢之照不遠，而雕蟲之見自佳。古人云，自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也。又安可受諛於愚鹵，取譏於書廚者哉！暇日因閱李杜集、元白詩，其間大海混茫，風流挺特；遂採摭奧妙，并諸賢達章句，不可備錄，各有編次。或閒窗展卷，或月榭行吟，韻高而桂魄爭光，詞麗而春色鬪美。但貴自樂所好，豈敢垂諸後昆。今纂諸家歌詩，共一千首，每一百首成卷，分之為十目，曰《才調集》。庶幾來者，不謂多言；他代有人，無嗤薄鑒云爾。<sup>43</sup>

以上八種主要的唐人選唐詩，在唐詩選學上有下列三個特點：「（一）明確的選詩標準和目的；（二）文人交遊的反映與文學流派的醞釀；（三）當代意識更濃。」<sup>44</sup>明人胡震亨指出：「唐人選唐詩，若國秀、極玄、河嶽英靈諸編均非巨帙，所謂代不數人，人不數篇者，誠至論也。足下所著富至千篇，而諸體各有短長，故入選者，或什五六，或什

<sup>42</sup> 參閱《又玄集》，「四庫全書電子版」，集部八，總集類，（上海：人民出版社）。

<sup>43</sup> 參閱《才調集》，「四庫全書電子版」，集部八，總集類，（上海：人民出版社）。

<sup>44</sup> 陳伯海主編，《唐詩學史稿》，（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129-130。

二三，所取不多，無足怪也。」<sup>45</sup>又云：「自宋以還，選唐詩者，迄無定論。大抵宋失穿鑿，元失猥褻，而其病總在畧盛唐詳晚唐，至楊伯謙氏，始揭盛唐為主，得其要領，復出四子為始音，以便區分，可稱千古偉識。」<sup>46</sup>以上關於唐人選唐詩所言極是，值得我們注意，因其所標舉揭櫫的詩選體式與去取標準，皆為歷代唐詩選本之重要參考。

## 9. 《全唐詩》

《全唐詩》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以「全」為稱號的斷代詩歌總集，其編選體例以人繫書，人各有簡略小傳，詩中間亦有校語。清康熙四十五年十月修纂完成的《全唐詩》，是以胡震亨的《唐音統》和季振宜的《唐詩》為底本，搜求遺佚補輯散落，彙編在它之前的各種唐詩版本，再加以校勘而成。與其他的彙輯本相比，御製《全唐詩》可以讓我們概見唐詩的全貌，共收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作者兩千兩百多人，計有九百卷。其序云：

詩至唐而衆體悉備，亦諸法畢該，故稱詩者，必視唐人為標準，如射之就彀率，治器之就規矩焉。蓋唐當開國之初，即用聲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傑之彥，悉從事於六義之學，以為進身之階，則習之者，固已專且勤矣，而又堂陛之賡和，友朋之贈處，與夫登臨讌賞之即事感懷，勞人遷客之觸物寓興，一舉而託之於詩。雖窮達殊途，悲愉異境，而以言乎摭寫性情，則其致一也。夫性情所寄，千載同符，安有運會之可區別。而論次唐人之詩者，輒執初、盛、中、晚，岐分疆陌。而抑揚軒輊之過甚，此皆後人強為之名，非通論也。自昔唐人選唐詩，有殷璠、元結、令狐楚、姚合數家。卷帙未為詳備，至宋初，撰輯英華，收錄唐篇什極盛。然詩以類從，仍多脫漏，未成一代鉅觀。朕茲發內府所有全唐詩，命諸詞臣，合唐音統籤諸編，參互校勘，蒐補缺遺，畧去初盛中晚之名，一依時代分置次第。其人有通籍登朝，歲月可考者，以歲月先後為斷。無可考者，則援據詩中所詠之事，與所同時之人繫焉。得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凡二千二百餘人，釐為九百卷。於是唐三百年詩人之菁華，咸采擷蒼萃於一編之內，亦可云大備矣。夫詩盈數萬，格調各殊，溯其學問本原，雖悉有師承指授，而其精思獨悟，不屑為苟同者，皆能殫其才力所至，沿尋風雅，以卓然自成其家。又其甚者，寧為幽僻竒譎，雜出於變風變雅之外，而絕不致有蹈襲剽竊之弊。是則唐人深造極詣之能事也，學者問途於此。探珠於淵海，選才於鄧林，博收約守，而不自失其性情之正，則真能善學唐人者矣，豈其漫無持擇，汎求優孟之形似者，可以語詩也哉？是用製序卷

<sup>45</sup> 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三十一。

<sup>46</sup> 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三十一。

首，以示刻全唐詩嘉與來學之旨，海內誦習者，尚其知朕意焉。<sup>47</sup>

由於清代帝王素喜唐詩清真雅正的風格，對於「眾體悉備、諸法畢該」的詩作極為賞識，又因康熙欲以溫厚平和之詩風粧點太平盛世，所以特別支持獎勵唐詩的編選工作。《全唐詩》卷帙浩繁搜羅完備，對於研究唐代的歷史、文化與文學，固然有極大的參考價值，但是由於編纂成書的時間過於短促，又加上參與工作的人力不足，因此，疏漏偽舛也就無法避免了。論者曾經指出，《全唐詩》缺點的有下列五點：「(一)誤收、漏收；(二)作品作家重出；(三)小傳、小注舛誤；(四)編次不當；(五)其他的問題，如書名誤植。」<sup>48</sup>這部曠世巨選由曹寅領軍，費時僅一年五個月，雖然搜羅較前賢之書全備，遺漏還是不少，尤其是中晚唐詩缺失更多。《全唐詩》的編者將有唐一代詩歌匯為一帙，他們收集了大部分的唐詩，也記載了許許多多有名無名的詩人，便於後來的研究者檢閱利用，自是厥功甚偉。然康熙於遴選編校人員時，過份重視他們的詩才，而忽略了選家應有的學識修養，這些辭章之士雖頗有詩才，對於唐詩學卻缺乏研究，即便戮力從事也未能盡如人意，遂令此選不免烙有時代的印記與局限。<sup>49</sup>

#### 10. 蘅塘退士孫洙《唐詩三百首》

雖然歷來唐詩選本極多，但是《唐詩三百首》自問世後便廣受歡迎，旋即取代了《千家詩》，成為當時童蒙詩教的最佳讀本。《唐詩三百首》自刊刻以來，早已家喻戶曉，其成功之處乃在於選詩愜於人心，從五萬多首唐詩中擇取代表性的詩家作品，自是不易，編選時要依傍前賢且又能同中求異，尤屬難能可貴。孫洙(1711~1778)，字臨西，號蘅塘退士，江蘇無錫人。乾隆十六年(1751)進士，歷官大城、盧龍、鄒平知縣，後改江寧教授，但總的來說，宦海自是一番浮沉，他的生平不甚得意，因此乃悄然歸隱自稱退士。《唐詩三百首》是由蘅塘退士孫洙，及其續娶的夫人徐蘭英日夕吟誦，共同努力編選而成的。根據孫洙的自序，他因不滿於《千家詩》選詩標準過於寬鬆浮濫，好壞均收精麤莫辨，只錄七律和五絕的詩作，且涵蓋了唐宋兩代詩人，與體製不甚吻合，遂就唐詩中擇其膾炙人口佳篇，編成一書，以供童蒙詩教之用，並有典範垂訓後世之圖。他說：

世俗兒童就學，即授《千家詩》，取其易於成誦，故流傳不廢。但其詩隨手掇拾，工拙莫辨，且止五七律絕二體，而唐宋人又雜出其間，殊乖體制。因專就唐詩中膾炙人口之作，擇其尤要者，每體得數十首，共三百餘首，錄成一編，為家塾課本，俾童而習之，白首亦莫能廢，較千家詩不遠勝耶？諺云：『熟讀唐詩三百首，

<sup>47</sup> 參見《全唐詩》的點校說明，《全唐詩》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頁1。

<sup>48</sup> 《全唐詩》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頁2-3。

<sup>49</sup> 周勛初，〈康熙御定《全唐詩》的時代印記與局限〉，《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五卷，第二期(1995年)，頁1-12。

不會吟詩也會吟。』請以是編驗之。<sup>50</sup>

如此一來，通俗易解、便於吟誦，乃成為是書重要的編選指標，也更能符合童蒙教材「易簡」的原則。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編者一方面少選或不選詘屈難解之詩，另一方面就是儘量多選容易上口的詩篇，像這樣以簡馭繁的選詩結果，自然是能風行海內人手一冊的了。千百年來的唐詩選本各擅勝場，反映出編選者獨到的智慧與眼光，其中尤以明人李燮龍的《唐詩選》、清人王士禛的《唐賢三昧集》、以及沈德潛的《唐詩別裁集》，對孫洙編年選《唐詩三百首》的影響最大。又據近人考證，《唐詩三百首》其實是以沈德潛的《唐詩別裁集》為底本，兩書選詩相同者竟有二百二十二首之多，另外，次序編排及突顯李白、杜甫等盛唐詩人也如出一轍。與《唐詩別裁集》相較，孫洙刪去了長律增加樂府一類，讓體裁更為完備。根據金性堯的研究，孫洙的選本題材極其四平八穩，是可以雅俗共賞的，也能符合今日讀者的要求，它有以下幾個不錯的特點，可為後來的選本作一參考：(1) 三百首的篇目適度；(2) 所收作者包括「三教九流」，皇帝、和尚、歌女、無名氏都有；(3) 所選作品既完備又分體裁；(4) 注重藝術性，而這些藝術性又多是通過抒情手段來表現；(5) 可接受性；(6) 兼重實用；(7) 有所依傍，有所突破。<sup>51</sup>

本書共選唐詩三百餘首，收錄七十餘家詩，孫洙選詩雖頗具代表性，各式體裁風格兼備，但仍囿於所見不無遺珠之憾，例如多數作品都有淺近通俗的特色，選詩著重於委婉含蓄的抒情詩篇，較少深遂綿密的寫實之作，同時也忽略了瑰麗奇詭的歌詠，例如杜甫的〈三吏〉、〈三別〉竟然漏掉了，而李賀的詩一首也沒收錄，實在殊為可惜。另外，為了應付清代舉業之須，本書也選取了一些試帖詩、應制詩，以為科考所用之範例，尤其甚者，就中對若干詩作的評論仍不脫八股習氣，讀來但覺其淺薄可笑，此乃編者囿於時代之見，有以致之。另一方面，雖則編者揭櫫淺俗易誦的原則，然證之其入選詩篇，實際情形並非如此，唐詩中最為淺切流俗者，莫過於元白、張王之新樂府詩，而這類詩竟未見入選。再者，李商隱的詩素以晦澀難解著稱，連元好問都要說「獨恨無人作鄭箋」了，可是義山這類詩作入選的倒還真不少。因此，我們很難說淺俗就是此一選本的特色，似乎也不是它能流傳廣遠的主因。

如以體裁來區分，《唐詩三百首》所選作品從古體到近體都有，入選詩作風格也多樣化，真可謂是「眾體悉備，諸法畢該」，能反映出唐代各體詩發展的情形。現存所有的版本都是按照體裁來編排，較早的版本分為六卷：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絕、七絕，後來又有八卷本，就把七古分成兩卷，亦將七言樂府單獨成卷。全書分體編排，先分類再按年代編排，計有五言古詩 33 首、樂府 7 首、七言古詩 28 首、樂府 14 首、五言律詩 80 首、七言律詩 50 首、樂府 1 首、五言絕句 29 首、樂府 8 首、七言絕句 51 首、

<sup>50</sup> 金性堯編著，《唐詩三百首新注》，(台北：書林出版公司，1990年)頁11。

<sup>51</sup> 金性堯編著，《唐詩三百首新注》，(台北：書林出版公司，1990年)頁2-8。

樂府 9 首，共 310 首。其中古體詩約佔三分之一，律、絕等近體詩約佔三分之二，而五言古詩和樂府、七言古詩和樂府這兩大類，其總數之和相差無幾。本書收所初唐詩人不及十家，其他盛、中、晚唐詩客各二十餘位，就中入選詩作最多的前五位依序為杜甫的 36 首、王維的 30 首、李白的 29 首、李商隱的 24 首、孟浩然的 15 首，這樣嚴謹的選詩取材標準，自與一般的文學史殊無二致，也可反映出此選本的代表性。另一方面，就個別作家的作品而言，我們也可以發現編者選錄得當，能針對不同詩人各取所長，如李白多收其五、七古和樂府，韋應物多收其五言古詩，王昌齡的詩則七絕較多見，於此亦可看編者識見不凡之處。

千百年來，唐詩得以周行流傳，全賴各式各樣的選本，這些唐詩選本對於入選之作，具有推薦和傳播的功用，有些詩篇因選本之搜集編纂，才得以保存留傳後世。職是之故，唐詩選本對唐詩有刪蕪存精的作用，選家往往於操選政之際，根據自己的審美旨趣和取捨標準，從數以萬計的詩篇中，挑選出一些可以傳世的作品，那些未能入選的詩作便遭到淘汰，極可能就失去了留存後世的機會。綜觀歷代唐詩選本，選家的審美品味與選詩尺度不一，在編排體例上也差異頗大，有的依詩人之時代先後，有的則以詩歌體裁來區分，也有的根據題材加以分類，更有的將時代先後與詩體結合起來編纂。至於義疏校評方面，也是各式各樣不拘一格，舉凡詳注、簡注、箋注和題解都有，有的選本評點字斟句酌，有的則是即興綴語，有的更是借題發揮申述己意。在箋釋方法上，有的選家側重史實考證，有的則強調章法結構，也有的著眼於藝術風格。<sup>52</sup>徐安琪指出數量眾多、體製完備的唐詩選本，對唐詩研究之深遠影響有四：

(一) 唐詩選本的序言、題跋、凡例、總論、批語、評點，為我們提供了歷代唐詩研究理論的重要依據；(二) 唐詩選本的目的、體例編排也透露出歷代唐詩研究的寶貴信息，諸如編者的基本傾向、某一詩人或某種詩體在各個朝代的興衰起落等等；(三) 唐詩選本為我們提供了研究詩論家詩學思想的資料；(四) 唐詩選本尤其是《唐人選唐詩》是校勘、輯佚、考訂唐詩的資料。<sup>53</sup>

總而言之，歷代唐詩選集的編定往往有其明確的宗旨，對於作品取捨的標準相是相當嚴格的，而選家操選政時也就得慧眼獨具，方可達到去蕪存菁、汰劣換優的效果。施蟄存於〈歷代唐詩選本敘錄〉中，就編列了四十四種唐宋元明清唐詩選本的重要書目，以為研讀唐詩者之參考。唐以後的唐詩選本無慮數百家，雖然各有各的去取標準，大抵

<sup>52</sup> 徐安琪著，《大唐文化的奇葩—『唐詩三百首』》，(雲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頁 11-15。徐氏此書論及《唐詩三百首》的作者及成書過程、唐詩選本與詩選學、孫洙編選《唐詩三百首》、《唐詩三百首》的編選體例、《唐詩三百首》選詩的思想傾向和審美情趣，例如溫柔敦厚的選詩宗旨、崇尚自然的審美情趣、「熟讀」「會吟」的實用目的。

<sup>53</sup> 徐安琪著，《大唐文化的奇葩—『唐詩三百首』》，(雲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頁 15-21。

上都能反映選家的審美旨趣和詩學修養。宋元以來，唐詩選本最多，然各皆有其特點，亦能從不同的角度來展現唐詩流變的情形，尤其是專體詩選具有詩學典範的意義。降及明清，唐詩選本的美學旨趣、形式體制、題材內容和分門別類，愈來愈加多采多姿，呈現出繁花盛景的現象。而這些詩選的共同特色就是：「內容豐富、形式多樣、風格各異、趨尚有別、編選宗旨多元、體例完備、眾體兼具，」<sup>54</sup>舉例來說，王安石《唐百家詩選》、元好問《唐詩鼓吹》、楊士弘《唐音》、高棅《唐詩品彙》、李攀龍《唐詩選》、胡震亨《唐音統識》、鍾惺、譚元春《唐詩歸》、王士禎《唐賢三昧集》以及沈德潛《唐詩別裁集》等諸作，可說是唐詩在典律化的過程中的具體成果展現。以現今的眼光來看，上述這些唐詩選集，就文學接受與傳播而言，就已然具備下列四種時代意義：

(一)反映了一種成熟的詩歌美學趣味，對文學的接受傾向有著重大的影響；(二)主要從藝術表現是否成熟的角度，對某一階段的詩歌進行選擇評判，從而能較為客觀地顯示文學發展的狀況；(三)普及或推廣詩歌創作方法，對社會進行詩歌鑑賞的基礎教育；(四)選編一些特殊題材、特殊風格的詩文，顯示了唐代文學接受的豐富多姿。<sup>55</sup>

上述這些歷代唐詩選家的審美鑑賞批評，有助於我們對唐詩美學在意境風格上的整體掌握，從唐初對秀句巧語的選輯與講究復古通變，到唐末的緣情側豔和感事寫意，中間歷經盛、中唐時期的獨倡風雅、清新淡泊以及清思苦吟，這些不同的詩學觀念與審美旨趣，也都反映在林林總總的選本之中。最後附帶一提的是，晚唐人顧陶(*fl.* 783)積三十年之功，編成《唐詩類選》一書，所錄詩作「始自有唐，迄於近歿，凡一千二百三十二首，分為二十卷。」<sup>56</sup>顧陶的《唐詩類選》是第一本綜合性的選本，他按照詩歌的題材內容來分類編集，因此書名乃作「類選」，在諸多的唐人選唐詩之中，其規模是較為宏大的。然而，可惜這本書已經失傳，只有序和後序留存於《全唐文》中。<sup>57</sup>他在序文裏先略論唐詩的發展和特點，再品評此前的唐詩選本，最後也提出自己的選詩原則和方法：

國朝以來，人多反古，德澤廣被，詩之作者繼出，則有杜、李挺生於時，羣才莫得而並。其亞則昌齡、伯玉、雲卿、千運、應物、益、適、建、況、鵠、當、光義、郊、愈、籍、合十數子，挺然頽波間，得蘇、李、劉、謝之風骨，多為清德

<sup>54</sup> 賀嚴著，《清代唐詩選本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11-12。

<sup>55</sup> 尚學鋒、過常玉、郭英德等著，《中國古典文學接受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247-254。

<sup>56</sup> 周祖譔，《隋唐五代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頁300。

<sup>57</sup> 孫琴安著，《唐詩選本提要》，(上海：上海書店，2005年)，頁18-20。



之所諷覽，乃能抑退浮偽流艷之辭宜矣。爰有律體，祖尚清巧，以切語對為工，以絕聲病為能，則有沈、宋、燕公、九齡、嚴、劉、錢、孟、司空曙、李端、二皇甫之流，實繫其數。皆妙於新韻，播名當時。亦可謂守章句之範，不失其正者矣。

然物無全工，而欲篇詠盈千，盡為絕唱，其可得乎？雖前賢纂錄不少，殊途同歸，《英靈》、《間氣》、《正聲》、《南薰》之類，朗照之下，罕有子遺，而取捨之時，能無少誤？未有游諸門英菁畢萃，成篇卷而玷類全無。詩家之流，語多及此。豈識者寡，擇者多？實以體詞不一，憎愛有殊。苟非通而鑒之，焉可盡其善者？由是諸集悉閱，且無情勢相託，以雅直尤異成章而已。或聲流樂府，或句在人口，雖靡所紀錄，而關切時病者，此乃究其姓家，無所失之；或風韻標特，譏興深遠，雖已在他集，而汨沒於未至者，亦復掇而取焉；或詞多鄭衛，或音涉巴歛，苟不虧六義之要，安能間之也？既歷稔盈篋，搜竒畧罄，終恨見之不徧，無慮選之不公。<sup>58</sup>

看來顧陶的選詩標準，是與殷璠的一樣，都以取風骨聲律為標的，而顧陶隻眼別具，是第一個推重李、杜的選家。與殷璠相比，顧陶更加重視儒家的詩教說，因此特別偏愛騷雅一類的詩作，甚至將杜甫置於李白之上。顧陶強調詩歌關切時病的功用，他認為那些「風韻標特，譏興深遠」的篇章，其思想與藝術價值較高。雖則如是，顧陶對於那些淫詞麗句也予選錄，只要它們不違詩三百篇的六義之說。接著，顧陶言及選家的一偏之見，由於「體詞不一，憎愛有殊」，在主客觀的差異影響之下，操選政時根本無法面面俱到。由上引顧陶之言，我們亦可得知此前諸家唐詩選本獨漏杜甫的原因，職是顧陶為補前人之失，於操選政時力求公正，「不懼勢逼，不為利遷」，採取「通而鑒之」的態度，可說是相當謹慎嚴肅的。顧陶的取捨標準是相當寬泛的，雖然重視古體、風骨和騷雅之作，但是近體、綺麗，「詞多鄭、魏」之音者亦不拒選。因此，總的來說，顧陶的詩學觀是以雅正為主，入選之作要存諷諭系盛衰，抑退浮偽流豔且能關切時病，這是一本極有參考價值的唐人選唐詩總集。<sup>59</sup>

## 二、唐宋詞選評研究

宋人詞集之編纂始自宋代本朝，雖然當時詞已經成為一種文體，但是仍不被正統文學認可，因此，大多數的文人並未將詞作收入文集中，一般的文人個別詞集都是集外單行的，這種情形要到南宋才有所改變。從宋詞別集流行於當世的情況來看，唐宋詞選為

<sup>58</sup> 周祖譔，《隋唐五代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頁300。

<sup>59</sup> 王運熙、楊明著，《中國文學批評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639-643。

數想必不少，雖然現在我們能見到的詞集就只有十種：《雲謠集雜曲子》、《花間集》、《尊前集》、《金奩集》、《梅苑》、《樂府雅詞》、《草堂詩餘》、《花庵詞選》、《唐宋諸賢絕妙詞選》、《中興以來絕妙詞選》、《陽春白雪》、《絕妙好詞》。於今觀之，唐宋詞選仍有很大的詞學史料價值，因為從這些選集中我們可以窺見唐宋詞發展的過程，以及不同流派的風格特色所在。<sup>60</sup>此外，唐宋人選唐宋詞，亦能真實反映當時人詞的審美趣味，對於我們了解唐宋人的詞學觀是極有助益的。上述這些詞集可說是目前所存唐宋人選唐宋詞的全部，值得我們仔細研究其編選的標準，因為這些選集對後世影響甚大，尤其是對宋、元、明、清的詞學思潮影響至鉅。

### 1. 《花間集》

詞是隋唐燕樂與前代清樂、雅樂混合的產物，在歷經了民間因樂作辭、文人以詩入歌的階段之後，中唐文人開始倚聲填詞，正式宣告詞為詩之重要體裁。晚唐以還，李氏王朝一如夕照垂豔，國勢已然不堪聞問，雖則兵燹四起戰禍頻仍，但是隨著城市商業的興盛，處處可見秦樓楚館歌臺舞榭，北里之香風挾清絕之詞以俱下，歌妓在花下尊前伴君聊佐清歡、宴樂助觴，其所展現的基本上是一種綺靡婉媚的風格情調。《花間集》是中國古代第一部文人詞集，此書具現晚唐五代男性詞人的妍麗風格，而〈花間集序〉也可以用來說明「詞為豔科」的當行本色。宋人論詞往往以《花間集》為詞體正宗，從集序中也能窺見西蜀詞人集體的創作情形，以及當時「詩客曲子詞」編集的狀況，對於瞭解文人詞的成熟趣味，是有莫大的助益。歐陽炯的〈花間集序〉，是一篇頗為完整的詞論專文，值得我們在此詳加探究：

鏤玉雕瓊，擬代工而迴巧，裁花剪葉，奪春艷以爭鮮。是以唱《雲謠》則金母詞清；挹霞醴則穆王心醉。名高《白雪》，聲聲而自合鸞歌；響遏行雲，字字而偏諧鳳律。《楊柳》《大堤》之句，樂府相傳；《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製。莫不爭高門下，三千玳瑁之簪；競富樽前，數十珊瑚之樹。則有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絕之詞，用助嬌嬈之態。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娼風。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秀而不實。有唐已降，率土之濱。家家之香徑春風，寧尋越豔；處處之紅樓夜月，自鎖嫦娥。在明皇朝，則有李太白應制《清平樂》詞四首。近代溫飛卿復有《金筌集》。邇來作者，無愧前人。今衛尉少卿字弘基，以拾翠洲邊，自得羽毛之異；織綃泉底，獨殊機杼之功。廣會眾賓，時延佳論。因集近來詩客曲子詞五百首，分為十卷。以炯粗預知音，辱請命題，仍為敘引。昔郢人有歌《陽春》者，號為絕唱，乃命之為《花間集》。庶使西園英哲，相資羽蓋之歡；南國嬋娟，休唱蓮舟之引。時

<sup>60</sup> 唐珪章編，《全宋詞【一】》，（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5。

大蜀廣政三年夏四月日敘。<sup>61</sup>

在這篇序文裏，歐陽炯談及《花間集》的編撰時間、文化背景、編選目的、風格特徵，和詞曲的發展過程。此序不但確立溫庭筠為「花間鼻祖」之地位，同時也闡明了花間詞人的創作心態和花間詞的整體風貌。〈花間集序〉所顯示出的觀點是「詞為豔科」，這羣男性詞人填詞的目的乃在於，用其“清絕之辭”助歌妓演唱，展露她們的“嬌嬈之態”，而欲達此傳播效果，則有賴於手法含蓄蘊藉、文字綺麗流暢以及聲律諧協美聽的詩客曲子詞。《花間集》是一部搜輯歌本的詞選總集，它也是一部藝術上較為成熟的女人曲子詞，音律方面則以新興之燕樂曲詞來代替清樂歌詞。歐陽炯認為詞的獨特之處乃在於它能「合樂而唱」，因此他要求歌詞的字聲須合於音律，辭采則須講究鮮艷清絕，風格上也要符合「淺斟低唱」的柔靡情調。另一方面，此集採用以人繫詞的編集方法，按作者所處的時代先後來排列各家作品，以溫庭筠為詞集開端，所收詞作也以飛卿的為最多，無疑確立了他是「花間鼻祖」的地位。職是之故，論者亦嘗指出，此集與序文在詞學理論上的主要貢獻是：「其於五代之末總結了詞這種新興文體的體性特點，給了它一個明確的定位。詞以其新鮮動人、合樂可歌，緣情綺靡的特性而於近體詩外另立一宗。」<sup>62</sup>上述所言，對詞之體性特點，洵為的論，同時也可以說明《花間集》的選詞標準和審美旨趣。

## 2. 《尊前集》

《尊前集》是唐五代詞較早的選集之一，此書以人為序編次，選輯唐明皇、李白等帝王和文人詞三十六家，共二百九十五首詞作，與趙崇祚所編的《花間集》有互補之出處，可以說是《花間集》的姐妹篇。《尊前集》共二卷，其編纂者不詳，它保存了溫庭筠以前的唐人詞，以及前後蜀以外的五代詞，彌補了《花間集》的不足之處，因此也較符合有唐一代詞之發展的實際情形。《尊前集》收錄的作者較《花間集》為多，所收詩作涵蓋之時空，亦比《花間集》來得更久遠廣闊，同時反映出早期文人詞的基本風貌及其發展歷程，這就是此書在詞學上的最主要價值。這本詞總集所收詞題材相當廣泛，有描寫愛情婚姻的況味，也有的詞作反映士大夫嚮往隱逸生活，還有其他許多不同領域的刻劃，它在藝術風格上是較為多樣化，這一點是和《花間集》大不相同的。《四庫全書提要》云：

尊前集二卷，原本不著撰人，名氏前有萬曆間，嘉興顧梧芳序云：余愛花間集，欲播傳之，而余斯編第有類焉。似即梧芳所輯，故毛晉亦謂梧芳採錄名篇，釐為二卷，而朱彝尊跋則謂：「於吳下得吳寬手抄本，取顧本勘之，詞人之先後、樂

<sup>61</sup> 朱恒夫注釋，《新譯花間集》，（台北：三民，1998年），頁1-2。

<sup>62</sup> 蔣哲倫、傅蓉蓉著，《中國詩學史：詞學卷》，（廈門：鷺江出版社，2002年），頁40。

章之次第，靡有不同，因定為宋初人編輯。」考宋張炎樂府指迷曰：「粵自隋唐以來，聲詩間為長短句，至唐人則有《尊前花間集》，似乎此書與《花間集》皆為五代舊本。然陳振孫書錄解題歌詞，類以花間集為首，注曰：此近世倚聲填詞之祖，而無尊前集之名，不應張炎見之，而陳振孫不見。彝尊定為宋本亦未可盡憑，疑以傳疑，無庸強詞選之屬臣指。且就詞而論，原不失為花間之驂乘，玩其情采，足資沾溉，亦不必定求其人，以實之也。」<sup>63</sup>

### 3. 《梅苑》

《梅苑》十卷，為南宋初蜀人黃大輿所編，為現存最早的專題詠物詞選，專集詠梅之詞，起自唐代，迄於南北宋之交，共錄四百餘首。因為宋人偏愛梅花，幾乎各家皆有題吟，詩詞中常見詠梅之製，一時蔚為風尚，《梅苑》之輯，只是反映時賢雅好而已。此集以題材為選取標準，堪稱首創，而編者選詞旨在存人，書中保存了不少宋代無名氏的詞作，所以在輯佚價值方面是相當高的。可是，此一選集的體例甚是鬆散，所錄詞作既不以詞調類別，也不依詞人分排，有時題名甚顯雜亂無章。黃大輿的自序：

梅苑十卷，宋黃大輿編。王灼稱大輿歌辭，與唐名輩相角，其樂府號廣變風，有賦梅花數曲，亦自奇特。然樂府今不傳，惟此集僅存。所錄皆詠梅之辭，起于唐代，止于南北宋間。自序稱己酉之冬，抱疾山陽三徑，埽迹所居，齋前更植梅一株。晦朔未周，畧已粲然，於是錄唐以來才士之作，以為齋居之玩，命之曰：《梅苑》。考己酉為建炎二年正，高宗航海之詞選之屬臣。歲山陽又戰伐之衝，不知大輿何以獨得蕭閒，編輯是集。殆己酉字有誤乎，昔屈宋徧陳香艸，獨不及梅，六代及唐篇什，亦寥寥可數。自宋人始，絕重此花，人人吟詠。方回撰瀛奎律髓，於著題之外，別出梅花一類，不使溷於羣芳。大輿此集亦是志也，雖一題裒至數百闕，或不免窠臼相因，而刻畫形容，亦往往各出新意，固倚聲者之所採擇也。集中兼采蠟梅，蓋二花別種同時，義可附見，至九卷兼及楊梅，則務博之失，不自知其泛濫矣。<sup>64</sup>

### 4. 《花菴詞選》

《花菴詞選》為南宋人黃昇所編選，是今存宋代規模最大的詞集，共收四千三百餘首詞作，係由《唐宋諸賢絕妙詞選》、《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兩部分所組成，前部十卷收唐五代至北宋一百三十四家詞，後部十卷錄南宋八十九家詞。黃氏選詞以「博觀約取」著稱，雖云兼收並蓄，選目卻極為精審，於入選詞家亦能注意到他們各種風格的詞作，

<sup>63</sup> 參閱《尊前集》，「四庫全書電子版」，集部十，詞曲類二，詞選之屬，（上海：人民出版社）。

<sup>64</sup> 參閱《梅苑》，「四庫全書電子版」，集部十，詞曲類二，詞選之屬，（上海：人民出版社）。

並不以一家一派為尚。書中各詞人名下皆有簡介，多錄詞人姓名、字號、籍貫、仕履簡況等，且部分詞作之下亦有評語，頗具詞學文獻價值。黃氏此書選錄了宋詞中的優秀作品，可代表宋詞的最高成就，因此向來備受好評。此外，是選的最大特色在於，編者一反南宋人既定的詞學觀念，那種認為唯有供花間尊前淺斟低唱，助綺羅兒女聊佐清歡，才是講究格律嚴謹的正宗詞作：

長短句始於唐，盛於宋。唐詞具載花間集，宋詞多見於曾端伯所編而復雅一集，又兼采唐宋迄於宣和之季，凡四千三百餘首，亦備矣。況中興以來作者繼出，及乎近世，人各有詞，詞各有體，知之而未見，見之而未盡者，不勝算也。暇日哀集得數百家，名之曰：《絕妙詞選》。佳詞豈能盡錄，亦嘗鼎一臠而已。然其盛麗如游金張之堂，妖冶如攬嬙施之祛，悲壯如三閭，豪俊如五陵。花前月底，舉盃清唱，合以紫簫，節以紅牙，飄飄然作騎鶴揚州之想，信可樂也。親友劉誠甫，謀刊諸梓傳之好事者，此意善矣。又錄予舊作數十首，附於後，不無珠玉在側之媿，有愛我者，其為刪之，淳祐己酉百五玉林。<sup>65</sup>

#### 5. 《絕妙好詞箋》

《絕妙好詞箋》是宋末元初人周密所編的南宋詞選集，共分為七卷，收錄了南宋一百三十二個詞人之作，輯有三百八十四首詞，可以說是一部採擷極廣的總集，而其所選詞亦頗為精審。此書以人編次，大抵按時代先後順序排列，自張孝祥至仇遠，保存了許多名不見經傳的南宋詞人之作，當中就有不少人的作品因此集而得以存留至今。編者周密本為南宋一大詞家，其詞作工麗精巧，尤善於詠物，於選詞去取謹嚴，特別推重「清空騷雅」的風格，故選錄作品以姜夔一派詞人的居多，而其所選詞作則頗為精粹多樣，多借景詠物以抒情，於流連光景處不無哀世傷亂之思。此書所錄詞作題材廣泛，從寫景紀游到嘆別傷悼，從懷古諷諭到思鄉愛國，在整體的情調上並非「一味輕柔圓膩」。故此，就書中大部分詞作的表達內容與描寫技巧而言，皆有其品賞價值，可與其他選本參詳比較一番。清人厲鶚有序云：

絕妙好詞七卷，南宋弁陽老人周密公謹所輯。宋人選本朝詞，如曾端伯樂府雅詞、黃叔暘花菴詞選皆讓其精粹。蓋詞家之準的也，所采多紹興迄德祐間人，自二三鉅公外，姓字多不著。夫士生隱約，不得樹立功業，炳煥天壤，僅以詞章垂稱後世，而姓字猶在若滅若沒間，無人為從故紙堆中抉剔出之，豈非一大恨事耶！津門查君蓮坡，研精風雅，耽玩倚聲，披閱之暇，隨筆劄記，輯有詩餘紀事，如干卷于是編，尤所留意特為之箋，不獨諸人里居出處，十得八九，而詞中之本事，

<sup>65</sup> 參閱《花菴詞選》，「四庫全書電子版」，集部十，詞曲類二，詞選之屬，（上海：人民出版社）。

詞外之佚事，以及名篇秀句零珠碎金，攬拾無遺，俾讀者展卷時，恍然如聆其笑語而共其游歷也。予與蓮坡有同好，向嘗綴拾一二，每自矜翫獲，會以衣食奔走，不克卒業。及來津門見蓮坡所輯，頗有望洋之歎，并舉以付之次第，增入焉。譬諸掇遺材以裨建章，投片瓊以厠懸圃。其為用不已微乎，蓮坡通懷集益，猶不忘所自，必欲附賤名於簡端，辭不得已，因述其顛末如此云。乾隆戊辰閏七夕前三日錢塘厲鶚書於津門之古春小茨。<sup>66</sup>

## 6. 《草堂詩餘》

《草堂詩餘》為南宋書坊所編，原是商賈為謀利而編，是以所選甚為蕪雜，編輯亦乏體例，書分成前後集，各有上下二卷。前集分為春景、夏景、秋景、冬景四類，後集則分為節序、天文、地理、人物、人事、飲饌、器用，花禽等七類，這種編輯方法，是為了方便學者模擬。《草堂詩餘》是宋代的流行歌曲集，各詞皆流麗平易，專為應歌而設，入選詞作以蘇東坡、柳永、秦觀、周邦彥為最多。坊間編刻此書乃是為了在歌樓舞榭或勾欄瓦舍之中，供人演唱之用而輯錄的唱本，因此所選錄作品均為流暢婉麗者。此書原序是一篇詞學的重要文獻，根據《四庫全書》提要，顧子汝所刻之《草堂詩餘》付梓，就教於東海何良俊，何良俊便說出以下的話來：

宋初，因李太白〈憶秦娥〉、〈菩薩蠻〉二詞以漸創製，至周待制領太晟府樂，比切聲調十二律，各有篇目。柳屯田加增至二百餘調，一時文士復相擬作，而詩餘為極盛。然作者既多，中間不無昧於音節。如蘇長公者，人猶以“鐵絳板唱‘大江東去’”譏之，他復何言耶！由是詩餘復不行，而金元人始為歌曲。蓋北人之曲，以九宮統之，九宮之外，別有道宮、高平、般涉三調，總一十二調。南人之歌，亦有南九宮，然南歌或多與絲竹不叶，豈所謂土氣偏訛，鍾律不得調平者耶？……總而覈之，則詩亡而後有樂府，樂府闕而後有詩餘，詩餘廢而後有歌曲。

大抵創自盛朝，廢於叔世。元聲在，則為法省，而易諧人氣，乖則用法嚴而難叶，茲蓋其興革之大較也。然樂府以皦逕厲為工，詩餘以婉麗流暢為美，即草堂詩餘所載，如周清真、張子野、秦少遊、晁叔原諸人之作，柔情曼聲，摹寫殆盡，正詞家所謂當行所謂本色者也。<sup>67</sup>

從上引何氏之言可知，詞曲一家，兩者之間本無鴻溝存在，兩者甚且具有共同的外在形式——音樂。再者，對何良俊來說，詞曲的根本價值不在其內部，而是在其所依托

<sup>66</sup> 參閱《絕妙好詞箋》，「四庫全書電子版」，集部十，詞曲類二，詞選之屬，（上海：人民出版社）。

<sup>67</sup> 陳良運主編，《中國歷代詞學論著選》，（南昌：百花洲文藝，1998年），頁367-368。

的音樂形式，「聳耳動聽」就成為其評論詞曲之尺度。於此，何良俊亦使用了「當行」、「本色」的術語，這乃是他曲論的核心所在。此外，何良俊非常重視詞曲的社會作用，他特別提醒讀者除了欣賞文句之工，更要注意歌曲裨補教化的功能。

### 7. 朱祖謀《宋詞三百首》

今人唐圭章編《全宋詞》、孔凡禮編《全宋詞補輯》，共收詞作兩萬零八百多首，詞人一千四百三十餘家，可說是宋代三百二十年的詞作總匯，雖然方便學者之研究，但是卻不利於初學者入門。有鑑於此，為求雅俗共賞和普及詞學，清末詞學名家朱祖謀（1857~1931）乃編選《宋詞三百首》，嘉惠廣大莘莘學子。《宋詞三百首》自問世以來，流行極為廣大深遠，幾乎與《唐詩三百首》一樣，家喻戶曉老少皆知，已經成為學習宋詞者的案頭必備書了。朱祖謀，又名孝臧，字古微，號彊村，浙江歸安人，是晚清著名的大詞人，詞風「抗古邁絕」，同時又集清代詞學之大成，校刻唐宋金元詞之別集百十餘家、總集若干，都為《彊村叢書》一編，收集甚富，校堪精審，對詞學研究之貢獻良多。張高評指出，由於彊村先生晚年所選之宋詞，「能取精用闕，抉擇至當，納須彌於芥子，以微塵見大千」，故在詞學史上有一定的價值，可讓我們透過選本了解他的詞學思想。<sup>68</sup> 再次，朱彊村以“三百首”為選，頗思與《唐詩三百首》互別苗頭。孫洙所選《唐詩三百首》是為了供童蒙詩教之用，好有箇門徑入手處，故編選時以通俗易解、便於吟誦為原則。而朱彊村編選《宋詞三百首》之苦心亦復如此，也是要把它當作學詞者的基礎，通過對這三百闕宋詞的反復吟詠深刻體會，以求一窺宋代詞人之堂奧。況周頤曾為此書寫序，論及了朱祖謀選詞的緣由和標準：「彊村先生嘗選宋詞三百首，為小阮逸馨誦習之資，大要求之體格、神致，以渾成為主旨。夫渾成未遽詣極也，能循塗守轍於三百首之中，必能取取精用闕於三百首之外，益神明變化於詞外求之，則夫體格、神致間尤有無形之訢合，自然之妙造，即更進於渾成，要亦未為止境。」<sup>69</sup> 此書之體格神致悉以「渾成」為旨歸，能做到兼收並蓄不棄遺珠，在眾多宋詞選集裏是較好的一部了。但是，這個選本也有其缺點，囿於時代風氣和朱氏本人的偏好，竟然漏選了部分宋詞的經典之作，所選以長調居多，某些作品也過於晦澀，另外某些詞作也有誤植失考之處。雖則如此，並不妨害其流行。<sup>70</sup>

《宋詞三百首》有多種刻本流行於世，朱氏本人亦嘗增刪其選目，而就中以唐圭璋先生的箋注本值得注意，「遺事珍聞，廣蒐博採；諸家評薦，粲然大備，學者稱便」<sup>71</sup>，其流傳較廣影響更大。然而，唐氏此書箋注評語有點簡略，仍舊不易為一般青年學子所理解。《宋詞三百首》收錄兩宋詞人 85 家，彊村先生所選宋詞，詞客大家盡數囊括，名

<sup>68</sup> 參見張高評序文，載於楊海明著，《宋詞三百首鑑賞》，（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5年）頁1。

<sup>69</sup> 汪中註譯，《新譯宋詞三百首》，（台北：三民書局，1999年），頁1。

<sup>70</sup> 畢寶魁編著，《宋詞三百首譯注評》，（台北：，2004年），頁22-25。

<sup>71</sup> 參見張高評序文，載於楊海明著，《宋詞三百首鑑賞》，（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5年）頁1。

篇悉收且篇篇可誦。收錄於此書的詞作，篇首以宋徽宗始，北宋早期詞家如張先、晏殊、歐陽修、柳永、晏幾道、蘇東坡、秦少游，北宋末期則有周邦彥、賀方回，南宋有辛棄疾、姜夔、吳文英、周密、王沂孫。就入選《宋詞三百首》諸家之數量而言，以吳文英的 25 首為最多，周邦彥 22 首居次，再下來姜夔 17 首占第三位、再下來則是晏幾道 15 首、柳永 13 首、賀鑄 11 首。另外，對於蘇辛詞，選家也是極為重視的，蘇軾的詞就選了 10 首，辛棄疾的則有 12 首之多。這八家的作品幾乎占了全書之半，從數據上加以歸納，我們得知朱氏偏愛周邦彥、吳文英的詞，或許他認為清真詞和夢窗詞可以符合其詞學理想，「音韻和諧，文字典麗，思致深湛，不吐不露，特立獨行」，似乎有意推許周、吳兩位格律派詞人為一代宗主。<sup>72</sup>雖然朱祖謀未曾明言其編選取向，但是我們仍舊可從書中察覺其審美旨趣所在，與其他選家的詞學觀頗為不同，而此一編選取向就分別表現在詞體風格類型、表現手法和作者創作意圖三方面。論者指出朱氏主要的編選取向或「偏重婉約典雅的詞風，以寫景或男女為題材，去興發人生感觸，」抑或「偏重以章法頓挫的表現手法，和善於融化前人典故，而含蓄地抒發情意的作品，以及那些作者本意隱匿不明的詞作。」<sup>73</sup>因此，朱氏的選詞標準是「重大——渾成——自然」，入選之作無不符合這三點，詞旨往往包蘊於字裏行間，讀者可從中推求作者比興之意，所以他講究詞之體格與神致的結合，而體格乃求之神致，性靈便出於自然。

#### 8. 唐圭璋《全宋詞》、孔凡禮《全宋詞補輯》

現代詞學大師唐圭璋（1901-1990）自編纂《全宋詞》開始，窮畢生之力於詞學文獻的編輯整理，其詞學成就斐然，對後來的詞學研究影響至鉅，而《詞學論叢》一書便是他最主要的詞學論著。在唐圭璋之前，宋人詞籍的編纂已有明人毛晉的《宋六十一名家詞》等十數種，唐氏在既有的基礎上，廣泛搜羅詞籍詞作，經過修訂後共收入詞人一千三百三十餘家，詞一萬九千九百餘首，殘篇五百三十幾首。這是一部求「全」的資料書，其主要的讀者對象為研究工作者，因此「網羅散失，雖斷句零章，亦加摭拾。」或謂「是編嚴詩詞之辨，凡五七言絕及古詩均不闖入。」又云「是編以作者為經，以時代先後為序。」總而言之，《全宋詞》的獨特之處及其優點甚為明顯，論者嘗指出：

第一，確實做到“全”；第二，擇用善本足本，校讎最精，注明版本，附列存疑之詞和斷句，有互見者皆一一注明，凡補輯者亦注明來源；第三，詞人小傳均在考證的基礎上簡明地介紹作者生卒年、里貫、簡歷及詞作情況，較為準確；第四，附錄了宋人話本小說中人物詞、元明小說話本中依托宋人詞和作者索引。這樣為

<sup>72</sup> 蔣哲倫、傅蓉蓉著，《中國詩學史：詞學卷》，（廈門：鷺江，2002年），頁319-321。

<sup>73</sup> 侯雅文，〈論朱祖謀《宋詞三百首》所建構的「宋詞史」及其在清代宋詞典律史上的意義〉，《彰化師大國文學志》，第十二期，（2006年6月）：頁328。



研究宋詞者提供了完整可靠的一代文獻。<sup>74</sup>

《全宋詞》以人繫詞，各人皆有簡要小傳，此總一集蒐羅完備、博采眾長，所取各家詞作又多出自善本、足本。與前人詞選各書相較，唐圭璋的《全宋詞》初版和新版，非惟收錄愈益齊備，體例亦更臻整全，改變以前的編排方式，以時代順序來編排。此外，在考定上較前精審甚多，唐氏以別出心裁的跋尾形式，對宋詞別集的版本源流、優劣異同和其他相關問題，一一為之詳考述評，誤收失考之作大多予以更正，宋詞中雜亂之象便不復存在。就詞集的編纂而言，唐氏之選亦不免有其缺失，但是他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注重完整可靠的資料，對詞學文獻辨偽存真，他勇於糾正自己舊版的失誤，這些疏漏之處於新版中加以訂正。如另一方面，果我們整體合觀唐氏之編著，便可發現他於宋詞典律具有整全的宏觀意識，而其詞學思想也崇尚感情的真摯自然，並且主張善與美的統一，注重詞的藝術經營。<sup>75</sup>

除上述選本之外，胡適的《詞選》影響亦甚為深遠，編者把詞體當作白話文學的一種，看重蘇軾、辛棄疾而輕視吳文英、張炎，挑選詞作特別講究情感和意境，這都是因為他「推崇自然、反對模仿，推崇詩化、反對格律化」的緣故。<sup>76</sup>此外，鄭騫教授的《詞選》例言第二條說：「本書於各種風格，兼收並錄，不立宗派。凡傳誦之作，即使編者所持宗旨不同，亦均選錄。惟有二種風格在屏除之列：粗獷、纖佻。二者於詞為魔道，亦詞之敵也。」<sup>77</sup>此外，龍榆生以為選詞之目的有四：

一曰便歌，二曰傳人，三曰開宗，四曰尊體；前二者依他，後二者為我。操選政者，於斯四事必有所居；又往往因時代風氣之不同，各異其趣。自唐末以迄宋、金之世，詞家專集無慮數百家。前人率以詞為小道，孰肯專精致力於今？即或兀兀窮年，亦苦不能盡究；而典型之作，有足垂範後昆；或清麗之音，大為風行當世者；必有人出而抉擇彙集，以適應時世之需要，而選本尚焉。<sup>78</sup>

龍榆生認為選家目的既然不出上述「便歌」、「傳人」、「開宗」和尊體四種，那麼他們的去取標準則亦在此範圍之內。另一方面，胡雲翼於《宋詞選》的前言中提到他評選時的取舍標準：

<sup>74</sup> 謝桃坊著，《中國詞學史》，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頁555-556。

<sup>75</sup> 朱惠國著，《中國近世詞學思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355-368。

<sup>76</sup> 參見劉石，〈胡適的詞學思想與《詞選》〉，胡適選注，《宋詞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10-11。

<sup>77</sup> 鄭騫教授的《詞選》，（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95年），頁1。

<sup>78</sup> 龍榆生，〈選詞標準論〉，《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59。

我們根據思想性和藝術性統一的原則來評選宋詞，便不能不定出新的標準。這個選本是以蘇軾、辛棄疾為首的豪放派作為骨幹，重點選錄南宋愛國詞人的優秀作品，同時也照顧到其他風格流派的代表作，藉以窺見宋詞豐富多采的全貌。宋朝的民間詞流傳不多，好些無名氏的作品都不一定就是民間詞，這裏也選錄了其中一些優秀的篇什。為了使讀者比較全面地認識蘇、辛兩大詞人的精神面貌，我們選錄的幅度特別放寬一些。當然，他們的作品也必須首先經過批判，區別其精華和糟粕，然後才談得上吸收和借鑑。<sup>79</sup>

以上龍、胡二氏所言，皆為選家綜輯詞林珍樹奇葩時，應當仔細斟酌再三，操選政者不可不思慮之事。畢竟，深厚的詩學修養加上獨到的眼光，乃能去蕪存菁，為作者和讀者搭起橋樑，俾便詞林瓊筵盛開，令人流連忘返。總的來說，二十世紀的詞選本數量繁多，品質卻是良莠不齊，其中較有特色與影響力的選本也不少，除了上述幾種之外，俞陛雲、俞平伯與夏承焘等人的選本，從中可見編者個人的審美旨趣和選取標準，深深印染著時代的風習色彩，而這些選本無疑地也都參與了文學典律的歷史對話。

### 肆、中國詩詞「經典化」與讀者反應

中國傳統詩詞之典律化有許多推波助瀾的因素，諸如時代風氣、文體變革、政治思想、文化發展以及出版收藏等，在不同的歷史社會環境裏，或多或少都會影響特定選本的周行流布。然而，古典詩詞的創作與讀解畢竟是少數文士之事，詩詞典律的生成似乎取決於當時的社會菁英，各式各樣的詩詞選本也只有文人雅士方能傳釋，從古代為數甚多的詩話詞話或筆記序跋中，我們不難發現此一狹小之詮釋社群，對詩詞文本所運用的闡發詮解策略。古往今來多少詩詞的典籍英華，姑不論其編輯體例為何，也不管讀者的接受反應是怎樣，實際上它就是文士們的詩學論述場域，而選編者在學術、政治和社會的地位，無疑地又左右詩詞經典的形成。對此問題，論者也曾指出：「詩選集確實是傳統詩文論中最具體而有效的典律形式」<sup>80</sup>，在其間我們可以了解典律如何交替，而透過選集的編排方式，編者可以昭告其評選標準，在詩詞的經典化過程中，選編者亦能得知讀者的接受與反應，因為大多數人相信權威選本所有的文學價值，同時也從這些選集的史料中模仿借鏡，以為創新之參考依據。

《隋書·經籍志》對古籍的分類，明白標示經史子集四部，並將《楚辭》、別集、總集等劃入集部，雖然唐宋以降其中類目多所變更，但這種「四部」分類法後為清代《四庫全書》所採用，承襲至今。就《四庫全書》的分類內容而言，經、史、子、集已經涵

<sup>79</sup> 胡雲翼，《宋詞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24。

<sup>80</sup> 楊淑華，〈中國傳統詩選集的「典律」交替——以《古詩選》為探討核心〉，《台中師院學報》，頁147。

蓋古籍，而其中集部是指純文學作品及文學理論書籍，共分五類：楚辭類、別集類、總集類，詩文評類，詞曲類。所謂的集部，專指文學之部，既不屬於經史也非思想義理之類，更不是考證訓詁聲韻之學，它專以辭章為名，舉凡散文、韻文、駢文、詩、詞、戲曲、詩文評皆可歸屬於其範圍。於此，吾人可知中國傳統文學經典的範圍，大致如上述的分類內容，雖然其認定的標準仍不無爭議，但是經長時間的積累已有世所公認的典籍代表，諸如《詩經》、《楚辭》、漢賦、《古詩十九首》、漢魏樂府、六朝詩文《世說新語》，《陶淵明集》、唐人傳奇、唐宋古文、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傳奇、章回小說、明清小品文、《古文觀止》等等。另外，朱自清在《經典常談》一書裡，於羣經、先秦諸子、史書、集部等典籍敘其源流，採擇近人新說，參照傳統的意見對經書略作討論，並指出閱讀經典是個人學識的基本訓練，希望藉由這本書的引導介紹，能提升國人對讀經的興趣，進而了解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真可謂用心良苦。<sup>81</sup>

另一方面，關於「典律化」(canonization)的問題，canon 源於古希臘 Kanon 一詞，意指作為測量儀器的葦桿或木棍，後來引伸為規則或法規。大約在公元四世紀的時候，canon 這個詞用來表示一系列的文本或作者，特別是早期基督神學家的著作，而這些經典著作的認定或排除，便與對聖經的詮釋大有關係。聖經經典的形成自有複雜的過程，但其中所牽涉到的宗教社團的標準、假值判斷和政治內涵，都是極為重要的因素。聖經典律化對西方文學鉅著的認定，在觀念上不無啟發作用，一部作品是如何成為典範的？一部作品又怎樣變成經典呢？如何評判作品之高下，可能與某一特定群體的意識形態有關，但也可能受到個人的興趣或偏見左右。與此相關，十九世紀的法國文學批評家聖·佩甫(Charles-Augustin Sainte-Beuve, 1804-1869)曾為「經典作家」下過定義：

真正的經典，作者豐富了人類的心靈，擴充了心靈的寶藏，令心靈更往前邁進一步，發現了一些無可置疑的道的真理，或者在那似乎已經被徹底探測了解了的人心中，再度掌握住某些永恆的熱情；他的思想、觀察、發現，無論以什麼形式出現，必然開闊、寬廣、精緻、通達、明斷而優美；他訴諸屬於全世界的個人獨特風格，對所有的人類說話。那種風格不依賴新詞彙而自然清爽，歷久彌新，與時並進。<sup>82</sup>

此處聖·佩甫強調我們必須藉由對經典作家的閱讀、追認、探索來建立一標準的模範，超越文學的語言形式技巧，真正理解其內在的心靈和人類思想歷史永恆的聲音。至於中國的宗經觀念，論者以為劉勰是位具有特殊意識的批評家之一，他在《文心雕龍》

<sup>81</sup> 朱自清著，《經典常談》，(台北：世一，2002年)，頁1-5。

<sup>82</sup> Charles-Augustin Sainte-Beuve, "What is a Classic?" in Hazard Adams ed., *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1971), p.557; 譯文轉引自徐魯著，《重返經典閱讀之鄉》，(上海：上海教育，2001年)，頁18。

裡十分肯定儒家經典的力量，及其在文學文化史上的正統價值。劉勰相信經書的內容與風格都是最精粹的文學範式，並主張聖人明瞭如何使用優美的文字來傳達自然之道與人之情性。<sup>83</sup>劉氏認為「經典沈深，載籍浩瀚，實群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阜也。」因此摺摭經史，採摘詩騷文集，「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是以綜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摭理須覈。眾美輻輳，表裏發揮」，只有才學互相配合，方可達到推陳出新，運化無迹的功效。<sup>84</sup>職是之故，文學經典對劉勰來說，是唯一可以永存的心智證明，憑此文學作品的媒介載體，作家方能超越時空尚友古人，重新尋著永恆不朽的人生真諦。

二十世紀英國詩人及文學批評家艾略特（T.S.Eliot, 1888-1965）論文學經典時曾指出，真正的古典主義需要一種較為成熟的心智，此種心智能夠讓我們認識文學的歷史和歷史意識，因為對他而言，只有把文學家放在文學史的框架裡來觀察考量，才能看到偉大的文學傳統其影響力之強大，他說：

沒有任何詩人或藝術家具有全然獨立的意義。他的意義、評價均繫乎那些已經逝去的詩人及藝術家的評價。你無法個別地判斷他；你必須將他放置在那已作古的人之間，以茲對照或比較。我認為這是一個美學原理，而不僅是歷史批評。他要遵守和承襲的創作要素並非片面；當一個新的藝術品誕生時所經驗的一切，同時間亦一併發生於所有之前的藝術品上。這些現存的傳統實例本身形成一理想的法則，但它是不断經由新作品之引導來修定而成的。<sup>85</sup>

以上所引述艾略特論傳統與個人才具的話，可以使我們了解為什麼詩人必須以經典為模範，也同時斷言詩人必須打破這樣的傳統模式，因為在文學的創作與欣賞方面，一味守舊或無古典價值之維繫，都會扼殺文學的新生導致文學自身的消亡。另一方面，Harold Bloom 對不朽的文學經典有如下的看法：「一個由古至今最可靠的評價文學經典的準則就是：除非作品本身使讀者有一讀再讀的欲望，否則它就不具備成為經典的條件。」<sup>86</sup>在當今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愈加重要，而經典文學研究已面臨諸多的挑戰，對於經典的看法往往是兩極化，不管是質疑或捍衛，都必須思考自己的閱讀位置（reading position），因為文學經典涉及文化認同的問題，只有形成文學經典系列，才算是一個成熟的文化。但無可避免的是，總不乏持特定政治意識形態者，以此責求經典，甚至斥之為廢紙一堆的，也大有人在。因此就有人會問經典到底是文學的準

<sup>83</sup> 孫康宜著，《文學的聲音》，（台北：三民，2001年），頁169-189。

<sup>84</sup> 王更生著，《中國文學的本源》，（台北：學生，1988年），頁167-184。

<sup>85</sup> T.S.Eliot, "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 in Hazard Adams, ed., *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1971): 784; 譯文轉引自孫康宜，見氏著，《文學的聲音》，（台北：三民，2001年），頁180。

<sup>86</sup> Harold Bloom 著、高志仁譯，《西方正典》【上】，（台北：立緒，1998年），頁24。

則還是權力的準則？在經典構成(canon formation)的背後是否存在著權力的運作機制呢？研究文學經典如何構成，其實也是比較文學的重要理論課題之一，尤其在這樣一個多元開放眾聲喧嘩的時代，偉大文學傳統的悍將也聽到了經典的輓歌，而經典的裂變無疑表示經典重構(canon reformation)勢在必行。<sup>87</sup>

文學選集對作品的經典化自有其作用，但並非是主宰一切，常常會受制於選家操選政時的諸多考量而異，有時編者對作品雖不泛起死回生之功，然此一情形終究不多見。通常的現象就是，選家只能依循文學典律生成的準則而行，且或多或少地推波助瀾來鑄鑄經典。此外，選家們如何於今再現與傳遞中國文學經驗，這應是古典詩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來自不同歷史社會的讀者羣在迥異其趣的文化情境中，閱讀相同的文學選集時自然會有各自的「期待視野」，這種差異甚至在品賞現代文學也會有的，對此讀者反應與接受美學的問題，M.H. Abrams 在《諾頓英國文學選集》第四版的序言裏曾說：

然則，一個充滿活力的文學文化總是在進行中。讀者羣的興趣改變；新的文本為人發現；舊的文本善加編輯；新的學術資訊和批評觀點為世所知；師生亟需新材料以探究文學之面向。因此，編輯的策略一直是提出定期的修正，而此一修正主義無違於只呈現主要作品的原則，並設計將選集置放於當代文學的主流思潮，以及知識份子的識見和關懷之中。<sup>88</sup>

在文學典律的生成過程中，時有權力交替和典範誤讀的情形發生，而讀者的接受反應有時也會影響編選者的審美旨趣，致令其重構編選理念，以求選本在社會上能廣為流傳。與之相似，中國文學史上許多的作家和作品，其經典地位也是透過選本的方式而獲得的，例如陶淵明、杜甫、花間詞人、唐宋八大家等等，其典律化的過程亦有幾分曲折，然而唯有經過讀者的閱讀品評，才能賦予文學作品特有的意義與價值。究其實，任何選本都是一個已然完成且自足的有機體，選家只能「張網羅雀」，等待讀者的「自投羅網」，而讀者一旦進入選本的世界，也只能跟著選本走，慢慢進行對話交流。中國古典詩歌要籍保存了韻文菁華，編者蒐羅並篩選文學作品，往往會以文體、時代或編輯宗旨來「刪汰繁蕪，存其清英」，可展示選集編纂的豐富義蘊。一方面，這些選集的編排方式和讀者對它們的接受反應，都將參與文學典律的歷史對話，而另一方面，操選政者藉權力機制循政教途徑傳播，以及讀者對選集權威性的挑戰，凡此種種，皆與西方近世以來的正典論爭，頗有相似之處，值得吾人參照而觀。

<sup>87</sup> 王寧著，〈文化研究與經典文學研究〉，《全球化與文化研究》，（台北：揚智，2003年），頁103-115；Hazard Adams 作、曾珍珍譯，〈經典：文學的準則/權力的準則〉，《中外文學》，23.2(1994): 6-26 頁。

<sup>88</sup> M.H. Abrams et.al.,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Seventh Edition*, 4<sup>th</sup> ed., (New York &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1979), vol. 1, xxix.

## 伍、余寶琳的古典詩詞典律化研究

論及中國選本批評原理，余寶琳曾經引用詩人大衛·安廷（David Antin）的話來說明作者與選本的關係：「選集之於詩人猶如動物園之於動物」<sup>89</sup>，作者廁身于文苑詩海，其篇章究竟何時得見天日以及如何展現，皆操之於“動物園”的主人—選家之手。安廷以動物園來類比詩選集，令人不禁要問這兩種文化形式的相似性在哪裏，園主和選家是如何置放與編排其對象，他們可能按照種類或其他的方法來安排展示的內容，並用傾全力搜集置放最佳的樣本，雖然也許會受制於個人愛憎和實際因素，而產生迥然不同的結果。談到中國經典形成的原動力，余寶琳認為其中最為重要的因素乃是價值判斷，正如我們想要編織美麗的花環，就得採摘最好的花朵一樣，選擇最有價值的文章，以維持人們對“精華”的理解。余氏也注意到了選集一詞在中國和歐洲古典的語根相似性，對某一選集之文本的中國傳統理解是，由一群作者所建造的文學花園。然則，花園的差異頗大，根據個人的品味而選擇不同的風格，正如同再創造過的選集內的中國詩，反映出譯者和編輯的選擇，以及中國詩是否垂手可得。余氏提醒我們說，當某一譯者已編輯過許多冊的中國詩，並無任何選集可以恰如其分地再現編輯的批評品味。

自從一九九〇年以來，余寶琳至少寫過六篇英文論文，從中西詩學傳統來詮釋詩歌選本的文學現象，這些篇章詳論古典詩詞選集、經典與典律化的相關問題，其中有不少看法發人深省，值得我們在此一一仔細探究。首先，在〈詩歌的定位—早期中國文學的選集與經典〉（“Poems in Their Place: Collections and Canons in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一文中，余寶琳詳細討論中國古典文本選集的價值，她認為：「以隱喻的且基於史實的方式，選集將詩置於定位，直接或間接地陳述那個時代的價值。」（anthologies put poems in their place metaphorically and historically, addres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values of the time.）<sup>90</sup>為佐證她的論點，余氏引用阿諾德·克拉佩特（Arnold Krupat）的話：「經典，一如所有的文化產物，從不是一種對被認為或據稱是最好的作品的單純選擇；更確切地說，它是那些看上去能最好地傳達與維繫，已經體制化並占有主導地位的語言產品。」<sup>91</sup>究其實，選集在文學典律化的過程中發揮作用，同時也顯示出文學流變的普世價值，更是選家參與敘寫文學史的一種批評方式。

不可諱言，許多選集深具選家的個人色彩，僅以唐人選唐詩觀之，其間便有選家在篩選標準上的差異。余氏首先檢視「安史之亂」前後三種唐詩要籍：殷璠《河岳英靈集》、芮挺章《國秀集》、元結《篋中集》，她將這些唐人選唐詩的討論聚焦於一種新生的「對

<sup>89</sup> 余寶琳著、曹虹譯，〈詩歌的定位—早期中國文學的選集與經典〉，《北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樂黛雲、陳珏編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254。

<sup>90</sup> Pauline Yu, “Poems in Their Place: Collections and Canons in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0.1 (June 1990): 196.

<sup>91</sup> *Ibid.*, 196.

立性質」，而此一對立性質又賦選家之詩觀予特徵，因此余氏乃指出，孔門政教詩學往往與當時文學的頹廢品味互有牴觸。余氏從殷璠的《河岳英靈集》開始追溯其發展脈絡，此一詩歌辯護取代了現代潮流，且在「早期詩歌的道德和政治階段」找到根本。而這三種選集鍾之中，又以元結《篋中集》的序最為尖銳刺耳，元結援用《詩經》的價值來為他的選集辯護，但是他也強烈地抨擊他同時代的人：

元結作《篋中集》成，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訂之？」對曰：「風雅不興，幾及千歲，溺於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名位不顯，年壽不將，獨無知音，不見稱顯，死而已矣，誰云無之。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為詞，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咏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污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今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聽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sup>92</sup>

另一方面，關於選集的實用功能，余寶琳認為選集能為人們提供正確的模式，特別是培養科舉考試時應題作詩的能力，她引述李又安（Adele Rickett）的話：「選擇與排除的過程，以及許多篇章之後的批評性評注，使批評家將他對於文學與文學的社會地位的理解付諸實踐。他的目標不僅是影響其同代與後代的人們對於文學的品味與理解，而且通過提供可資研究與效仿的過去的大師們的範本，使他們自身的創作日臻完善。」<sup>93</sup>不可諱言，許多選本的讀者都是從自己的立場出發，並且以訴求典範的觀點來閱讀和接受選本，所謂「《文選》爛，秀才半」，或「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正是此意。因為選本的目的乃在於提供讀者某種創作示範，透過對這些佳篇妙章的學習模仿，讀者便能從中了解其藝術風格與表現手法。

假如中國古典詩歌選集與博物館的功能相仿，都是將某一作品從它原來的地方移置於苑囿之中，那麼編輯的過程也就再現選家的價值判斷，因為選入或排除某一作品，皆已顯露出編者的文學信念和審美旨趣。讀者也許假設某些詩是某些選家有意捨棄，或是怠慢地輕忽其藝術價值，如此去取之後便決定作品之高下。然而，另外一群選家可能抱持相異的觀點，其所展現的選本樣貌將會迥然不同，余寶琳因此斷言抉擇之重要，尤其是受多元文化主義的影響，中國古典詩在西方的傳播與接受，全取決於選家對詩人、詩作和譯者的選擇，同時也端賴時代風格與詩歌形式格律的平衡。關於選集之重要與價值所在，余寶琳如是歸結道：「故此對於每一位對傳統中國的評價研究、文學或文學性的理論、文學和文學價值的體制化，以及文學史感興趣的人，一般而言，文集提供了豐富的，

<sup>92</sup> 周祖謨編選，《隋唐五代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頁125-126。

<sup>93</sup> Rickett, Adele Austin. "The Anthologist as Literary Critic in China."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 19 (1975): 146. 譯文引自余寶琳著、曹虹譯，〈詩歌的定位—早期中國文學的選集與經典〉，《北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樂黛雲、陳珏編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258。



激人興味的，且無疑是難以窮盡的資料。」<sup>94</sup>

在〈御覽詩：九世紀初的皇家趣味〉（“Poems for the Emperor: Imperial Tastes in the Early Ninth Century”）一文中，余寶琳首先指出，像中國古代那般卷帙浩繁的選集，希臘或拉丁的傳統典籍亦難與其相較，例如〈隋書經籍志〉列舉了 249 種選集，其中就有 107 種之多，到了西元 656 年編輯時，仍然完整地留存下來。在綜理編選經籍這方面，唐代承前朝之遺緒，帝國初始階段就有大型的概覽和百科全書產生，為日後官修史書提供重要的典範。終李唐之世，詩選集之所以挺出盛行，當與此文林採擷英華之風氣有關。大約有六十種詩歌選集列入了兩唐書，許多種選本還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就中有九種仍刊佈流行於世，這些後來都收錄在清代學者王士禛（1634-1711）的《十種唐詩選》裏。如果我們檢視這些原始選本的標題，就可以發現一套又一套不同的原則支配著這些選集的選擇和組織架構，泰半皆按初、盛、中、晚唐的歷史分期加以編排。有的選家以單一的地理區域，或特別的社會團體來編排詩歌選集，此外也有的人只選某一種詩歌的次文類，不管是宴飲、離別或應試之詩作。更有人聚焦於單一的詩歌體裁，諸如律詩或絕句。

近二十幾年來北美詞學研究異軍突起，不少有心人積極推動研究發展，傳統詩文的研究者並不畫地自限，經常跨行到詞學領域，就詞之體裁特性、主題內容、形式技巧等問題相互切磋琢磨。余寶琳和宇文所安都是美國漢學界推動詞學研究的能手，他們曾籌辦過國際詞學研討會，會中嘗就「關詞之美學特性與形式問題，關於女性問題與社會背景，以及關於詞評、詞籍保存與詞的接受等問題」深入探討。<sup>95</sup>據此學術會議之成果，其後。余氏更獨力編輯成《中國（曲子）詞的聲音》（1994）一書，除了卷首導論之外，並撰寫〈詞與正典：詞選一瞥〉探討歷來詞集綜輯編選的諸多問題，特別強調在詞之典律化的過程中，我們應當注意詞人怎樣填詞，以及各式各樣的讀者如何讀解詞作。<sup>96</sup>余氏自言此文檢視詞體風格之演進，追溯「宋詞之聲」的正統化過程，特別著力於探究八世紀中葉以降的詞集編選。余氏認為選集所形塑的文類觀念，尤其是對詞體的位階和定義，其要眇宜修意內言外的特性，仍舊依違於正統的詩歌經典觀，其歷史地位處於搖擺不定的狀態之中。<sup>97</sup>為了方便討論起見，作者將此文分成以下七個小節：（一）詩歌選集與經典的形成；（二）《花間集》的正統化努力；（三）南宋詞選之再評估與一新正統之定位；（四）衝突的立場；（五）清代的經典與經典性；（六）後來的再定位；（七）結論。余氏此文之章法結構十分嚴謹，層層推論舉例說明，其中不乏對此議題的真知灼見，頗

<sup>94</sup> *Ibid.*, 276-277.

<sup>95</sup> 孫康宜著，《晚唐迄北宋詞體演進與詞人風格》，李爽學譯，（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4年），頁 269-271。

<sup>96</sup> See Pauline Yu, “Introduction,” and “Song Lyrics and the Canon: A Look at Anthologies of *Tz'u*,” in the *Voices of the Song Lyric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ix-xxi & 70-103.

<sup>97</sup> See Pauline Yu, “Introduction,” in the *Voices of the Song Lyric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xv-xvi .



能反映出作者精湛厚實的中西詩學修養，允為當代北美漢學界探究詞與正典的力作。此外，余國蕃教授對余寶琳這篇論文也提出建議，值得我們引以為戒，他說：「在研究『正典（canon）』時，不能只看重序跋之類的材料，還應注意詞人如何填詞及讀者如何讀詞的問題。常人往往忽視讀者的重要，但讀者的意見實則很容易發展成為一種強大的傳統，會直接影響到『典律』的形成。」<sup>98</sup>

一九九八年的論文〈圖繪中國詩的景觀〉（“Charting the Landscape of Chinese Poetry”）承續此前的思維，余寶琳認為讀者的反應取決於其所接受到的資訊，因此，對於再創造的中國古典詩的讀者反應，將視譯者和編輯者的抉擇而定。從現有數量眾多的中國古典詩選集來看，有的會引起譯者的注意，而許多的選本卻因不同的理由為人輕忽。余氏說：「大部分的儒家經典實際上是選集，有的是詩歌，有的是歷史的，有的是說明性質的，有的是修辭散文，和有的是儀禮書寫。選擇與保存文學文本的推動力，周而復始地，從道德智慧的寶庫與歷史範例，延伸至其他各種不同的主題、範疇和意義」<sup>99</sup>在此之前，余氏亦曾論及選家編纂詩文集的動機，不外乎出於以下六種原因：校勘的、範例的、評價的、教授法的、綱領式的、偶然的。不管究竟是哪種動機使然，中國古代的選家們採擷文藻綜理翰粹，其實與現代電影中的剪輯手法，是頗為類似的。

## 陸、結論

眾所周知，操選政者綜輯詞藻，不是為了存人存文，就是想要標宗立派，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這是歷代選集的成規慣例。稼村類稿三十卷係由元人王義山所撰，他的〈乾坤清氣詩選跋〉：「作詩難，選詩尤難。荆公選唐百家詩，劉後村選唐宋詩，雖然詩豈易選哉！古詩二千餘篇，吾夫子刪為三百五篇，非夫子敢爾。東坡謂淵明好詩甚多，文選未盡錄。呂東萊編詩，謂淵明詩如歸田園，如問來使與夫飲酒責子擬古等詩，皆文選所遺。詩豈易選哉！」<sup>100</sup>正所謂「前修未密，後出轉精」，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選集，種類繁多的古典詩詞選集皆無法免於其時代之印記與局限，前人無法超越的障礙，後來者努力克服萬難，有可能取而代之。整理古典詩詞的總集或別集，或者是從事各式各樣的選集評點，就古典詩歌的研究而言，固然耗時費力且不易臻至理想，但仍是目前最為切要之事。從研究者方面來看，古典詩詞集是研究的基本資料，資料越豐富完善、正確可靠，相對地研究成果便越多。如就讀者的立場觀之，依憑整理好的集子去賞讀鑽研作品，則庶幾事半功倍。故此，論者乃指出，一部理想的古典詩集，至少應該具備下列五種功

<sup>98</sup> 孫康宜著，《晚唐迄北宋詞體演進與詞人風格》，李爽學譯，（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4年），頁272-273。

<sup>99</sup> “Pauline Yu, Charting the Landscape of Chinese Poetry,”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20 (Dec. 1998), pp. 71.

<sup>100</sup> 參閱《稼村類稿》，「四庫全書電子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卷十。

用：輯佚、校勘、箋釋、辨偽、有關作者的資料。<sup>101</sup>

然而，吾人欲選編評點古典詩詞，除了自身的學養、襟懷和眼光，恐怕還得兼備諸多詩歌以外的知識與工具，而此等知識與工具亦非操選政者皆有之。故此，讀者欲求一理想完善的詩詞選集，宛如人間別尋天書雲錦囊，只能靠奇緣巧遇了。正如李東陽所說的：「選詩誠難，必識足以兼諸家者，乃能選諸家；識足以兼一代者，乃能選一代。一代不數人，一人不數篇，而欲以一人選之，不亦難乎」<sup>102</sup>選家本身的聰明才智和知識學養，以及他所處的時代環境，無疑都會攸關選本的成敗與價值。修纂者透過選、刪、增、補、改、編的方式，或依某種美學判準，或依個人偏好，將作品按特定的類型或順序加以排列，並在序文跋語中表達一己的觀點，也不時在所選作品的中眉批評點。刪詩者對選本的處理方式，其實也可看出讀詩者的詮解之道，因此也可顯現選家的文學理念和審美趣味。凡此種種對古典詩詞的選評，都會影響到個別的作家作品在文學史上的接受與定位，而這也將有助於文學的典律化。職是之故，顧施禎在《盛朝詩選初集》的凡例中說過：「近詩選家林立，行世善本，各出手眼，概加評點。但作詩之人，各有興會，性情所至，形於咏言。而選者意為議論，或泛加褒美，殊失作者大旨。故是集就詩選詩，不敢妄加評點，意為溢詞也。」<sup>103</sup>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會說理想的古典詩詞選集根本不存在，因為任何選家手眼不一，也就難免會有一偏之見，顧此往往失彼，有所選輯也有所遺漏，綜理時如欲面面俱到，誠屬不易之事。

中國近現代的詞學名家屢屢論及詩詞選評的問題，他們的選本可作為一種批評的方式，選而評方能得其意之所在，除了「球琳珠玉，識者共知」之外，這些選家的各種序跋和凡例，都可以用來說明編者的審美旨趣與去取標準，例如俞陛雲（1868-1950）在唐五代詞選釋的敘中就說：「故蜀之《花間》，宋之《草堂》、《花庵》，昔操選政者，但有去取，不加評議。余為便於初學計，取唐賢之詞，循其文而申其意，蠡測之見，於昔賢宏旨微言，恐未能曲當也。」<sup>104</sup>又云：「余既為《唐詞選釋》示詞社諸子，復取五代詞，擇百餘調，加以箋釋，以申其義而暢其趣，俾初習詞者，審其徑途，以漸窺其堂奧焉。」<sup>105</sup>龍榆生（1902-1966）於《近三百年名家詞選·後記》亦曾言：「心緣物感，情隨事遷，風氣轉移，胥關世運。然而因革損益之故，固自有其消息可參也。喜見河清，境皆新闢。舊時選本，已多不適於來者之要求。頗思更就唐宋以來，迄於近代，別選長短句歌詞二三百首，略加銓釋，藉供借鏡。」<sup>106</sup>誠哉斯言！唐宋以還，詩詞作者何止萬人，選本亦

<sup>101</sup> 于大成，〈理想的古典詩集〉，《中國古典詩歌論集》，幼獅月刊主編，（台北：幼獅文化，1986年），頁477-505。

<sup>102</sup> 參見李東陽，《懷麓堂詩話》，卷三。

<sup>103</sup> 顧施禎，《盛朝詩選初集》，卷一。

<sup>104</sup> 俞陛雲撰，《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1。

<sup>105</sup> 俞陛雲撰，《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39。

<sup>106</sup> 龍榆生編選，《近三百年來名家詞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頁226。

無慮千百種，然則，因為作者身處的時代環境不同，與其個人性情才調互異，自是各有特色所長，吾人切勿偏廢任何一方。當然，一時有一時的風尚，一代有一代之選本，一家亦有一家之特質，固不可相強互責，編選者如能「博觀約取」，從各家專集中擷取精粹，聚為眾作有滋味者，以春秋義法審度衡量之，還詩人詩作之本來面目，不以今非古自我拘限，亦無宗派尊體之說，如此便能參與詩詞典律的生成過程。

## 參考書目

余寶琳著作目錄

(一) 英文著作：

### Books:

- Yu, Pauline, ed. *Voices of the Song Lyric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 , co-ed. *Culture and State in Chinese History: Conventions, Accommodations, and Critiqu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 co-ed. *Ways with Words: Writing about Reading Texts from Early China*. Berkeley and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 , co-ed. *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Volume I&II* New York: An Imprint of Addison Wesley Longman, Inc, 2004.

### Articles:

- Yu, Pauline. "Poems for the Emperor: Imperial Tastes in the Early Ninth Century" in *the Dragon and the Unicorn: Rhetoric and the Discourses of Power in Court Culture*, ed. David Knechtges and Eugene Vanc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forthcoming), 35 pp. ms.
- "Charting the Landscape of Chinese Poetry,"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20 (Dec. 1998), pp. 71-97.
- "Canon Form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ulture and State in Chinese History*, pp. 83-104.
-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Rethinking of Chinese Literary Studies," *Chinese/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ulletin*, 6-7 (March 1994), pp. 1-11
- "Introduction" and "Song Lyrics and the Canon: A Look at Anthologies of Tz'u," *Voices of the Song Lyric in China*, pp. ix-xxi, 70-103.
- "The Chinese Poetic Canon and Its Boundaries," John Hay, ed., *Boundaries in*

*Chinese Culture*. London: Reaktion Books, 1994, pp. 105-123.

- "Poems in Their Place: Collections and Canons in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0.1 (June 1990): 163-196; trans. by He Li in *Beimei Zhongguo gudian wenxue yanjiu mingjia shinian wenxuan [Ten Years of Selected Essays from Famous North American Scholars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ed. Yue Daiyun and Chen Yu (Nanjing: Jiangsu renmin chubanshe, 1996), pp. 254-284.
- "Collections, Canons, and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in *Literatures, Histories, and Literary Histories*, ed. Yang Zhouhan and Yue Daiyun (Shenyang: Liaoning, 1989), pp. 265-292 (early version of previous item).
- "Alienation Effect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 *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Literature*, ed. C. Koelb and S. Noakes (Cornell, 1988), pp. 162-175; trans. by Wang Xiaolu in *Zhongwai wenhua yu wenlun [Chinese-Foreign Cultures and Literary Theories]*, No. 3 (May 1997).

## (二) 中文翻譯：

- 余寶琳著、曹虹譯，〈詩歌的定位－早期中國文學的選集與經典〉，《北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樂黛雲、陳珏編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254-284。
- 余寶琳著、王曉路譯，〈間離效果：比較文學與中國傳統〉，《中西詩學對話》，王曉路著，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頁255-271。

## 其他參考文獻

### (一) 英文著作：

- Abrams, M.H. and Stephen Greenblatt, ed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Seventh Edition*. New York &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2000.
- Birrell, Anne, tr. *New Songs from Jade Terrace: An Anthology of Early Chinese Love Poetry*. London & Boston & Sydney: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82.
- Chaves, Jonathan, tr. & ed. *The Columbia Book of Later Chinese Poetry: Yuan,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 (1279-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 Fokkema, Douw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Problem of Canon Formation."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March 1996): 51-66.
- Francis, Mark E. "Canon Form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Chinese Canons, Sacred

- and Profane.” Yingjin Zhang ed. *China in Polycentric World: Essays in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50-70.
- Fusek, Lois, tr. *Among the Flowers: The Hua-chien ch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 Knechtges, David R., tr. *Wen xuan 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Volume One: Rhapsodies on Metropolis and Capitals & Volume Two: Rhapsodies on Sacrifices, Hunting, Travel, Sightseeing, Palaces and Halls, Rivers and Seas*. Taiwan Edition.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1982.
- Liu, Wu-chi & Irving Yu-cheng Lo, eds. *Sunflower Splendor: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oet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5.
- Lo, Irving Yu-cheng & William Schultz, eds. *Waiting for Unicorn: Poems and Lyrics of China's Last Dynasty, 1644-1911*.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 Ricci, Roslyn Joy. “Changing Approaches to Interpretation: Twentieth Century Re-creations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MA Thesis,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Adelaide, Australia, 2006.
- Rickett, Adele Austin. “The Anthologist as Literary Critic in China.”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 19 (1975): 146-165.
- Shields, Anna M. *Crafting a Collection: The Cultural Contexts and Poetic Practice of the Huajian Ji (Collection from Among the Flow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Sun, Kang-i.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Tz'u Poetry: From Late T'ang to Northern Su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 Watson, Burton, tr. & ed. *The Columbia Book of Chinese Poetry: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 (二) 中文著作：

- 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唐圭璋等校點，《唐宋人選唐宋詞》(上)、(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 于大成，〈理想的古典詩集〉，《中國古典詩歌論集》，幼獅月刊主編，台北：幼獅文化，1986年，頁477-505。
- 王兆鵬著，《詞學史料學》，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王運熙著，《漢魏六朝唐代文學論叢》，上海：復旦大學，2002年。
- 王運熙、楊明著，《中國文學批評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 王鍾陵著，《文學史新方法論》，台北：文史哲，2003年。
- 朱恒夫注釋，《新譯花間集》，台北：三民，1998年。
- 朱惠國著，《中國近世詞學思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 呂玉華著，《唐人選唐詩述論》，台北：文津，2004年。
- 杜治國，〈確立詩歌的正典——李攀龍詩論、選本及創作研究〉，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博士論文，2004年。
- 沈松勤、胡可先、陶然著，《唐詩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年。
- 李珍華、傅璇琮，〈唐人選唐詩與《河嶽英靈集》〉，《中國韻文學刊》，第二、三期，（1988年）：頁1-18。
- 吳明益，〈從詩史觀到理想典律——王漁洋擇定選集所映現的詩歌觀點與意涵〉，《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第一期，（1999年6月）：頁311-345。
- 吳明賢、李天道著，《唐人的詩歌理論》，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
- 吳熊和著，《唐宋詞通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
- 金開誠、葛兆光著，《古詩文要籍敘錄》，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 俞陛雲撰，《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侯雅文，〈論朱祖謀《宋詞三百首》所建構的「宋詞史」及其在清代宋詞典律史上的意義〉，《彰化師大國文學志》，第十二期，（2006年6月）：頁311-345。
- 施蟄存，〈歷代唐詩選本敘錄〉，《唐詩百話》，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1年，頁749-768。
- 馬承五，〈唐代詩文的編集與傳播〉，《唐詩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126-142。
- 徐秀菁，〈由選詞與評點的角度看張惠言《詞選》的中興寄託說的實踐〉，《彰化師大國文學志》，第十二期（2006年6月）：頁283-310。
- 倪進等著，〈唐人選唐詩〉，《中國詩學史：隋唐五代卷》，廈門：鷺江出版社，2002年，頁297-361。
- 孫康宜著，《文學的聲音》，台北：三民，2001年。
- 孫康宜著、李爽學譯，《晚唐迄北宋詞體演進與詞人風格》台北：聯經，1994年。
- 孫琴安著，《唐詩選本提要》，上海：上海書店，2005年。
- 張伯偉著，〈選本論〉，《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277-325。
- 張滌華著，《古代詩文總集選介》，台北：國文天地，1993年。
- 胡適選注，《詞選》，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胡雲翼選注，《宋詞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 傅璇琮著，《唐詩論學叢稿》，台北：文史哲，1995年。
- 賀巖著，《清代唐詩選本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 楊淑華，〈中國傳統詩選集的「典律」交替 —— 以《古詩選》為探討核心〉，《台中師院學報》，頁147-165。
- 郭英德等著，《中國古典文學接受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 郭英德等著，《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劉尊明著，《唐宋詞綜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 陳良運主編，《中國歷代詩學論著選》，南昌：百花洲文藝，1998年。
- 陳良運主編，《中國歷代詞學論著選》，南昌：百花洲文藝，1998年。
- 陳良運著，《中國詩學批評史》，南昌：江西人民，2001年。
- 陳伯海主編，《唐詩學史稿》，石家莊：河北人民，2004年。
- 陳伯海著，《唐詩學引論》，上海：東方，1996年。
- 陶敏、李一飛著，《隋唐五代文學史料學》，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 潘樹廣著，《中國文學史料學【下】》，台北：五南，1996年。
- 蔣寅主編，《中國古代文學通論：隋唐五代卷》，瀋陽：遼寧出版社，2005年。
- 蔣哲倫、傅蓉蓉著，《中國詩學史：詞學卷》，廈門：鷺江出版社，2002年。
- 鄔國平、王鎮遠著，《中國文學批評通史：清代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 蔡濯堂（思果），〈選本〉，《啄木集》，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85年，頁116-122。
- 顧易生等著，《中國文學批評通史：宋金元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 謝桃坊著，《中國詞學史》，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
- 嚴明著，《中國詩學與明清詩話》，台北：文津，2003年。
- 鄒雲湖著，《中國選本批評》，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
- 龍榆生編選，《近三百年來名家詞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
- 龍榆生編選，《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 Hazard Adams、曾珍珍譯，〈經典：文學的準則/權力的準則〉，《中外文學》，23.2 (1994): 6-26。
- Harold Bloom 著、高志仁譯，《西方正典》【上、下】，台北：立緒，1998年。

